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德国〕伯　尔著

孙凤城　孙坤荣译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生于科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雕刻匠。伯尔在中学毕业后当过学徒；1939年被征入伍，作为一个步兵，他经历了六年战争生活，多次受伤，还在美军的战俘营里当过战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科隆，在日耳曼语言学系学习，之后又当过职员。1951年起他专职创作，成为一个自由作家。1970—1972年，伯尔任西德笔会主席，1971年任国际笔会主席。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是表彰"他的创作，它们凭借他对时代的宽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

由于伯尔曾在战场上呆过多年，战前和战后又接触过大量中下层人民，因而他的作品反映的社会面比

较广阔。他主要写小说，也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主要作品有《列车正点到达》(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无主之家》(1954)、《我们早年的面包》(1955)、《九点半钟玩台球》(1959)、《一个妇女周围的群像》(1971)和《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等。他的作品大多反映战后西德社会情况，以人道主义观点同情小人物的遭遇，反对法西斯暴行和种族歧视，反对侵略战争。

在艺术上，伯尔作品的基调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但也在许多方面，象小说的结构、人物性格的刻划和主题思想的揭示等方面，采用了一些现代派的手法。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是伯尔的著名中篇小说。它讲述一个自食其力、性格坚强、作风正派的家庭助理员因遭到黄色报纸的无耻诽谤，迫使她最后终于开枪打死了捏造事实的记者这样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新鲜的故事。伯尔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这个普通的故事写得一环紧扣一环，生动而紧凑。更重要的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赋予这件事以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不仅涉及到了西德的政治经济界、文化新闻界、司法界，而且通过对女主人公遭遇的回顾，提出了诸如婚姻、宗教信仰等重要社会问题。由于作者严肃、辛辣而又不乏幽默的笔调，使作品中关于官方窃听电话的议论、关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看法等部分更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对女主人公勃罗姆、布洛纳夫人等形象的刻划，仅寥寥数笔又颇有深度，充分显示了伯尔在人物刻划上的出色才能。

（孙凤城）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末，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

一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查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以及情况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非要这样做不可，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他，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可是他又感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思考一下，那么非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情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虚构的成分，因而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差错，就象哈赫所犯的那样，也许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比较重要，有的则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

由于在这里谈了这么多有关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以一种“流动”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做“疏通”），凡是在童年时期（或者甚至在成年后）玩过积水坑游戏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打通，用小沟把它们彼此沟通，让水流出去，转移方向，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以便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按规定或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或者把它引向一条河道里。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无非就是“疏导”或叫做“排干”的工作，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那就请读者原谅，因为终究难免也会出现阻塞、淤积或搁浅，疏通未成以及“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和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三

在这里首先要报道的事实可能是有些残忍的：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妇女圣灰礼仪日① 的前夕。在某个城市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在傍晚将近十八点三刻的时候离家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

① 妇女圣灰礼仪日，耶稣复活节前四十天斋期的第一天。

四天后，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由此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水位差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十九点零四分左右——这位年轻妇女来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默丁的门铃。这位默丁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正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酋长。这位妇女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她在中午将近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她请默丁去把她的住所打开，并把死者弄走。她还报告说：她自己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再者，她还请求把她逮捕，她愿意到她的"亲爱的路德维希"那里去。

默丁由于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而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这里，我们不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因为只有必要的水位差才是不可避免的，流血的场面可以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这一类的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经常看到；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象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象排水还不如说更象是画

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样。

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那天，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发现用枪给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①]女人的年轻妇女开到那个树林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查明，在托特格斯身边发现的手枪绝不可能就是用来杀死舍纳的同一支手枪，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舍纳也是勃罗姆杀死的，因为这涉及到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可以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姆罗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后来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说：“是啊！为什么不把这个人也杀死呢？”但是一旦明确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现场，这种是她杀死舍纳的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凡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人，就决不会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就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开到丛林去的那个司机（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杂草

---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包括八个省。

丛生的灌木林更恰当些。”）根本就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年纪二十四到二十七岁的漂亮苗条、褐色头发的女顾客在这狂欢的节日里有好几十万在这里跑来跑去呢。”

在舍纳的住所里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发现有关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任何一点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五

有一位高级的狂欢节的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公众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任，这是它们的基础。”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的态度很不寻常，简直象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很大的版面登载讣告。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杀掉一个新闻记者仿佛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银行职员或者一个抢劫银行的匪徒都要重大得多。

新闻界这种过分渲染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录下来。因为不只是这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件特别恶劣的，特别可怕的，近乎肃穆的事件，甚至把它当作杀人祭神的宗教仪典来对待。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必须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什么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致于会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试图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我们最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因为还有一个问题要等待解释清楚，为什么象勃罗姆那样一个聪明而近乎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是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即是由她自己所造成的一瞬间，她不仅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七

现在让我们从最低的水位马上再回到高一点的水位上来。不再去管什么流血，让我们丢开新闻界的那种扰乱吧！在这期间，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住所已被打扫干净，不能再用的地毯扔到了拉圾堆里，家具也刷洗干净安置妥当，这一切都是由布洛纳博士经手花钱办理的。尽管还没有确定由他做她的财产监护人，但是通过他的朋友哈赫，他获得了这样做的权利。

在五年之内，这位卡塔琳娜·勃罗姆已经为一套价值十万马克的住所付了六万现款。正如她那位蹲在监狱里的哥哥所说的："这倒是笔牢靠的财产。"可是谁来为剩下的四万马克缴纳利息和分期付清呢？尽管就算房价会有所上涨。可是，勃罗姆不只有资产，同时却负着债。

托特格斯早已被埋葬（正如有些人所说，这次葬礼非常奢侈浪费）。奇怪的是舍纳的死亡及埋葬，就没有那样铺张，也没有那样大肆宣传。原因何在？是否因为他的死亡不是“职业的牺牲”，而只是妒嫉的牺牲的缘故呢？酋长的服装以及那支手枪（一支0.8口径的手枪）被存放到官方的物证室里。关于这支枪的来源，只有布洛纳是清楚的，那些警察和检察官们竭力要找出它的线索，但却没有成功。

八

对于勃罗姆在可疑的四天内的行动的调查，头几天的活动很清楚，但一碰到星期日，就弄不清楚了。

布洛纳在星期三下午亲自给了勃罗姆两周工资，每周二百八十马克。其中一笔是本周的工资，另一笔是预支下一周的，因为他和他的夫人在星期三下午要外出冬季休假。当时卡塔琳娜不仅向布洛纳保证，甚至发誓说，她一定也要休息一下，在狂欢节好好地娱乐，不再象过去几年那样一到节日就去做临时工。她还高兴地告诉布洛纳夫妇说，到那天晚上，她要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她已得到她的干妈，也就是她的女朋友和亲戚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的邀请。由于她好久没有机会跳舞了，对这次邀请感到很高兴。正由于如此，当时布洛纳夫人还对她这样说：“瞧着吧！小卡塔琳娜，我们回来后，也开个舞会，那你又可以跳舞了。”自从五、六年前她搬到城里来以后，卡塔琳娜常常抱怨没有机会“到哪个地方去跳跳舞”。因为在这个地方，就象她向布洛纳夫妇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些低级的酒店，在那里只能看到一些穷大学生寻找不用花钱的淫荡女人。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颓废派文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对她讲来同样过于

粗俗，而教会组织的舞会她根本是憎恶的。

星期三下午，卡塔琳娜还在海彼茨夫妇那里工作了两小时，这是很容易就调查出来的；她有时在那里临时帮忙。海彼茨夫妇在狂欢节期间正巧也要离开城市，到莱姆古去看他们的女儿，因而卡塔琳娜用她的大众牌小汽车把这两位老人送到了车站。虽然停车场挤得很，但她还是坚持把他们送到站台而且给他们提行李。（海彼茨夫人解释说：“她这样做，不是为了钱，对于这种殷勤我们根本不能给钱，这样做就会伤她的心。”）可以证明，火车是十七点半开出的。如果允许卡塔琳娜用五分到十分钟的时间在已经开始了的节日的热闹中去找到她的汽车，然后还给她二十或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开往坐落在城外公园住宅的住所，那么大概在十八点到十八点一刻之间她可以回到家里。这样，每一分钟都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允许她回家后洗一洗，换换衣服，吃一点东西，这样将近十九点二十五分她就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了。她没有坐汽车，而是坐电车去的，她既没有化装成阿拉伯女人也没有打扮成安达卢西亚妇女，只是在头发里插了支红色的石竹，穿上了红色的袜子和红色的鞋子，领子很高的衬衫是用蜜色河南绸做的，下身是同样颜色的一条普通的花呢裙子。人们也许会认为，卡塔琳娜坐的是汽车还是电车是无关紧要的，可是这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提，因为这在调查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九

从她踏进沃尔特斯海姆的家开始，调查就很容易。因为从十九点二十五分起，卡塔琳娜没有料到，她已经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从十九点三十分直到二十二点钟她离开这所住宅之

前，如她自己后来所供述的那样，她一直“单独地，亲热地”和一个名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着舞。

十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感谢检察官彼特·哈赫。正是由于他，人们才知道了只限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秘密通知，即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从勃罗姆和戈顿离开沃尔特斯海姆住所的那一刻开始，就下令窃听沃尔特斯海姆以及勃罗姆的电话。完成这项任务时所用的这一种方式，在这里讲讲也许是有价值的。碰到这种情况，巴埃兹曼纳总是打电话给有关的上司，向他说：“我又需要我的插头了。这次要两个。”

十一

显然戈顿没有从卡塔琳娜的住所向外打过电话。至少哈赫不知道他打过电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卡塔琳娜的住所受到严密的监视，直到星期四上午十点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见到戈顿离开这个住所。这叫巴埃兹曼纳失去了耐心和镇静，于是带着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去。他们在作了极为严密的安全预防措施后公然破门而入，对住宅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发现戈顿，只见卡塔琳娜“满不在乎地，甚至好象是很幸福地”站在厨房小桌子旁喝着一大杯咖啡，咬着一片涂了黄油和蜂蜜的白面包。她令人非常可疑，因为她不但一点也没有吃惊的样子，甚至给人以非常镇静，“尽管还不是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她穿着一件绣菊花的绿色布料浴衣，里边裸露着。当总监巴埃兹曼纳（就象她后来所讲的“相当粗暴地”）问她戈顿在

哪儿时，她回答说：她不知道戈顿什么时候离开住所的。她将近九点半钟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难道没有告别一下？""没有。"

十二

在这里人们会听到有关巴埃兹曼纳在这场合提出的一个最有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哈赫曾经捉弄地提了一下，但收回了；后来又讲到了，但第二次又撤回了。布洛纳却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因为他相信，如果当时确实是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恰恰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场合，就会使卡塔琳娜感到痛苦、羞赧和愤怒。因为据布洛纳和他的夫人的描述，卡塔琳娜·勃罗姆在两性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因而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巴埃兹曼纳当时由于不见了他本来确信可以落网的戈顿的踪迹，在盛怒之下会提出这个存疑的问题。据说巴埃兹曼纳向这个傲慢的、冷静地靠在小桌旁的卡塔琳娜这样问的："他跟你睡觉了吗？"卡塔琳娜听了满脸通红，却以骄傲的胜利的姿态回答说："不，我可不这样说。"

可以大胆地设想，如果巴埃兹曼纳真是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一刹那间开始，在他和卡塔琳娜之间就没有任何信赖可言。事实上他们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建立起一种信任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因此证明巴埃兹曼纳当真是提出过这个可疑的问题，尽管这个"并不那样恶劣的"巴埃兹曼纳确实试图这样做过。倒是那个参加搜查的哈赫，他在同事和友人中是个出名的"好色鬼"，当他眼看着这个很有诱惑力的勃罗姆懒洋洋地靠在小桌边上时，是他自己产生了这种卑劣的念头，乐意提出这个问题，或者甚至还想对她做出这类下流的举动来，这种可能性

倒是完全有的。

十三

紧接着勃罗姆的住所受到了彻底的搜查，没收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些文字性的东西。卡塔琳娜·勃罗姆被许可当着女警察普莱丝的面在浴室里换衣服，但是不准把门完全关紧，因为她是受到两个武装警察的严密监视的。他们允许卡塔琳娜带上她的手提包，因为她有被逮捕的可能。因此，她可以带上她的睡衣，盥洗用具袋和一些读物。她的藏书包括四本爱情小说，三本侦探小说和一本拿破仑传及瑞典女皇克丽丝蒂娜的传记，都是从图书俱乐部借来的。由于她不断地提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的责问，最后，女警察普莱丝就很客气地告诉她，路德维希·戈顿是个一直在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证实他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也许还有别的罪行。

十四

当卡塔琳娜最后在十一点钟离开住所，被带去审讯时，他们没有给她戴上手铐。最初巴埃兹曼纳坚持要给她戴上，但在和女警察普莱丝以及他的副手默丁经过一场短短的谈话之后，他就放弃了他的主张。由于这一天狂欢节已经开始，寓所的许多住户都没有去上班，但还没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已经来到的类似农神节① 的游行和欢庆等活动，因此这十层楼的公寓里，大约有三十多个居民穿着大衣、晨衣和浴衣在过道里站着。当

① 农神节，古罗马时代于每年十二月中在罗马举行庆祝农神的节日，后来和新年合在一起了。

卡塔琳娜·勃罗姆夹在巴埃兹曼纳和默丁之间，在武装警察的簇拥下离开电梯时，新闻摄影记者舍纳就在电梯前不远几步路的地方。她被从正面，背后，侧面各个角度照了许多相。后来，由于羞怯和迷惑，她几次想遮住她的脸，但这时手里拿着提包，盥洗用具袋和那只装有两本书及文具的塑料袋，因此很狼狈，头发弄乱了，脸上的表情很阴暗。

十五

她被带到了警察局，被允许略事准备，半小时后就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并作了记录。在场的有巴埃兹曼纳，默丁，普莱丝女士，还有检察官柯尔顿博士及哈赫。

"我的名字叫卡塔琳娜·布莱特罗，娘家姓勃罗姆。我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生于库依尔县的格曼斯布洛希。我的父亲叫彼得·勃罗姆，是个矿工。我六岁的时候，他由于在战争中肺部受过伤，已经去世，死时才三十七岁。战后他曾经在一个石板矿干活，可能就在那里得了矽肺病。父亲死后，由于救济局和工会意见不一致，我母亲就没有能够领到抚恤金。因为我父亲经常生病，家里的收入就相应地减少，我母亲不得不当各种临时工，我也很小就干家里的活。不过，虽然那时我得干许许多多的家务活，而且还不限于自己家里，还得为邻居，和村里别的住户烤面包，做菜，煮蜜饯，杀鸡宰鸭等等，却并没有影响我在学校的学业。除了许多家务劳动外，我还帮忙收割。一九六一年我退了学，在库依尔的一个干亲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帮助下，我在库依尔的格尔贝肉铺里当家庭女佣。在那里，有时我也帮着卖卖肉。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由于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帮助，主要是她在经济上作了支援，

使我得以进了库依尔的一所家政学校。而她就是那所学校里的一名教员。我的毕业成绩很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在附近的奥夫特斯布洛希的寇依勒商行的全日托儿所里当管理员，以后又在那地方的一个名叫克洛顿博士的医生家里当女佣。我在他家只呆了一年，因为那位博士先生经常对我纠缠不清，以致使博士夫人不能容忍。我也同样忍受不了，简直感到厌恶。一九六八年有几个星期我没有工作，就在家里帮母亲做做家务，后来在格曼斯布洛希鼓笛乐团的集会以及九柱戏游艺晚会上帮忙，通过我哥哥柯尔特·勃罗姆的介绍，认识了纺织工人威廉·布莱特罗，几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住在格曼斯布洛希，逢到周末，旅客往来频繁的时候，我常常到克洛格旅店的厨房去帮工，有时还当服务员。半年后，我对我的丈夫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厌恶感。关于这点我不愿意多说。以后我就离开他进了城。我被指控为‘恶意地离弃丈夫’，就这样我们离了婚，从此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姓名。最初，我借住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家里，几周以后，我在审计师菲耐姆博士家找到了管家兼女佣的工作，就搬到他家里住。菲耐姆博士给我机会参加夜校，继续念了一些课程，并且通过了管理员的国家考试。他为人很和蔼，而且很慷慨。我通过考试后，仍然还留在他那里。一九六九年年底，菲耐姆博士被指控与他任职的几家大公司所发生的大漏税事件有关，为此而遭到逮捕。在他被带走之前，他给了我装有三个月工资的一个信封，并且请求我留在他那里，帮着照看一下。他对我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我在他那里呆了一个月，照顾他事务所里的那些雇员，他们在税务机关人员的监视下照旧工作。我打扫屋子，收拾院子，还管洗涤。此外我还经常把洗干净的衣服送给呆在拘留所里的菲耐姆博士，还给他送一些吃的去，特别是常常给他送亚尔丁馅

饼，这是我在库依尔的格尔贝肉铺里学会做的。可是不久事务所被封闭了，房子也被没收了，我也就不得不离开那里。他侵吞和伪造文件的罪行好象已被证实了，于是菲耐姆博士先生就被正式送进了监狱。而我，在这之后，也还常常去探望他。我想把他给我的两个月工资退还给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不久我在布洛纳博士夫妇那里找到了工作；我是通过菲耐姆先生才认识他们的。

“布洛纳夫妇住在城南公园住宅区的一所避暑别墅里。虽然他们让我也住到那里去，但我回绝了，我愿意独立生活，这样，从事我的职业就可以具有更多的自由性。布洛纳夫妇对我非常仁爱。布洛纳博士夫人在一所很大的建筑公司工作，她帮我在南郊卫星城买下了一套住所，这所公寓曾经被誉为是‘临河雅寓’。布洛纳博士先生以工业法律顾问的身份，布洛纳夫人以建筑师的身份，都跟这所房子的筹建有密切关系。我曾和布洛纳博士先生合计过买下第八层那套有两间房间，带有厨房、浴室的住所的筹款、付息和分期付款问题。当时我已有的储蓄是七千马克，另外又由布洛纳夫妇作保借了三万马克，这样，我就于一九七〇年初搬进了这所房子。最初，每月我得付一千一百马克，但是因为布洛纳夫妇不要我付伙食费，布洛纳夫人甚至还每天塞给我食品。所以就节省了我的开支。因此我分期偿还债务要比一开始所预计的要快得多。四年来我一直独立生活；我的工作时间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十六点半。把屋子打扫干净，买好东西，准备好晚饭为止。我也管全家的洗涤工作。十六点半到十七点半之间我料理自己的家务事，然后常常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在退休的海彼茨夫妇那里工作。如果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也工作的话，可以另外得到报酬。我有空时常常到克洛夫特饮食店帮忙，或是帮着组织茶会、婚礼、交谊会或者舞会，多

半是我独自包办，自负盈亏。有时是受克洛夫特饮食店的委托。有时我做记账员或是集会的组织者；有时候又当厨师或是服务员。我的总收入平均每个月约一千八百到二千三百马克。税务局承认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自己纳税，交付保险费。有关申请纳税等等这类事情，全由布洛纳办事处免费给我办理。一九七二年春我买了一辆大众牌小汽车，一九六八年的产品。这辆车子是克洛夫特店的厨师凡尔纳·克洛尔默好意转让给我的。对我来说，要靠公共交通工具到我的不同的而且老在变动的工作地点，是很不方便的。有了这辆小汽车，我到一些距离较远的饭店举办茶会或者节日帮忙就方便得多了。”

十六

审讯从十一点半持续到十二点半，中断一个小时后，一点半又重新开始，到五点四十五分才把这一部分的审问结束。在休息午餐的时候，勃罗姆拒绝吃警察局给她的咖啡和乳酪面包；尽管对她明显地表示友好的普莱丝和默丁助理竭力相劝，她还是不肯吃。正如哈赫所说的，她显然不能把公与私区别开来，而且不理解审讯的必要性。巴埃兹曼纳敞开了领子，弄松了领带，津津有味地吃着咖啡和面包，仿佛不仅很慈祥，而且甚至变得父亲般地亲切时，勃罗姆就坚持请求把她带到拘留所去。负责看守她的两名警察不断地劝她吃咖啡和面包，但是她依然执拗地摇摇头，只是坐在木板床上，抽着烟。拘留所里有人呕吐后粘着的残余脏物，使她皱起鼻子，打恶心，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厌恶得难受。普莱丝女士和这两个看守人员劝她试试脉搏，后来她终于同意让普莱丝女士摸了摸她的脉。当证明脉搏正常后，她就让别人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拿来一块蛋糕和一

杯茶。尽管其中一名早晨她在浴室里换衣服时曾经守在门口的年轻警察打算为她掏腰包，但她坚持自己付这笔钱。为此，这两名警察和这位普莱丝女士对这一段插曲的评价是，认为卡塔琳娜·勃罗姆“毫无幽默感”。

十七

从十三点半到十七点四十五分继续审讯。巴埃兹曼纳希望她讲得简短些，但是勃罗姆在两位检察官的允许下坚持要详细讲。一开始巴埃兹曼纳很不乐意，后来也就同意了，因为把她所提供的背景详细地叙述一下，对他是很有用处的。

将近十七点四十五分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继续审讯，还是到此为止呢；把勃罗姆释放还是再把她送进拘留所去呢。将近十七点时，她同意喝一小壶茶，吃一块夹带火腿的面包，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审讯，因为巴埃兹曼纳答应审讯结束后可以放她回去。现在该讲到她跟沃尔特斯海姆女士之间的关系了。卡塔琳娜·勃罗姆说，她是她的干妈，她一直照顾着勃罗姆，是勃罗姆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当她一进城，这位女士马上就跟她取得了联系。

“二月二十日，我被邀请去她家参加家庭舞会。这次舞会本来预定在妇女圣灰礼仪日夜晚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但因为沃尔特斯海姆女士那天晚上有公事，所以提前了。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参加的舞会。说得更确切些：曾经有过几次，也许是二、三次，也可能是四次，我在布洛纳家跳过舞，那是我给他们家的晚会帮忙的时候。每次当我打扫洗涤完毕，把咖啡拿出去以后，就由布洛纳博士代我上酒，他们就请我参加晚会。我跟布洛纳博士跳过舞，还跟另外一些学院的、政治界的、经济界的

先生们跳过，后来我就不大愿意或只是勉强地跳过几次，最后就根本不再接受邀请了，原因是，这些先生们经常要喝醉酒，然后就在那儿无礼纠缠。说得清楚一些，就是自从我有自己的小汽车后，就拒绝这种邀请了。在这之前，我常常不得不请那些先生们中的某一位把我送回家去。我跟这位先生……”说到这里，她用手指了指哈赫，哈赫顿时面红耳赤，“也曾经跳过舞。”至于，哈赫是否也曾经对她纠缠，这个问题却没有提到。

十八

从审讯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卡塔琳娜·勃罗姆对每一个措词都是很认真地加以核对的，写在记录上的每一句句子她都要求念给她听。例如，在最后一段提到的“无礼纠缠”，最初在记录上写的是“温顺体贴”，原来的措词是“这些先生们变得温顺体贴起来”。卡塔琳娜·勃罗姆对此极为愤怒，坚决要求改正，于是在她和检察官之间，她和巴埃兹曼纳之间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有关字义的舌战。卡塔琳娜声称，“温顺体贴”是双方的，而“纠缠”是一种单方面的行动，而碰到的往往始终是后一种情况。当先生们认为，这一切并不如此重要，而且如果这次审讯比一般时间长的话，这将是她的责任，她回答说，如果在记录上以“体贴”代替了“纠缠”的话，她将拒绝在上面签字。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她会跟她的丈夫离婚，其理由之一，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她的丈夫从来就没有对她“体贴”过，只是一味地“纠缠”。

同样的用于布洛纳夫妇的“仁爱”一词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记录上写的是“对我很亲切”，而勃罗姆坚持用“仁爱”。当人家认为“仁爱”这词太旧，建议用“慈祥”来代替时，她就

冒火了。她说，“亲切”或“慈祥”跟“仁爱”都没有关系，只有用“仁爱”才能说明布洛纳夫妇对她的态度。

十九

在这期间，对勃罗姆的邻居也作了调查，其中绝大部分人对勃罗姆不熟悉，说不出什么来。有的人偶然在电梯上碰到过她，打过招呼，只知道她有一辆红色大众牌小汽车；有人以为她是一个主任秘书；有人把她当作某百货公司的科长，尽管这个人有点冷冰冰，但却总是很整洁、很和气。卡塔琳娜居住的第八层上的五套住所的住户里，只有两个人能讲出一点儿名堂来。其中之一是开理发店的施米尔夫人，还有一个是电厂的退休职员，名字叫罗维德尔。使人惊讶的是，这两个人都说，卡塔琳娜有时有绅士客人来拜访，有时她还带着绅士客人回家。施米尔夫人说，这种拜访是有规律性的，差不多隔二、三周来一次。那位客人年龄在四十上下，富有活力，“显然”来自“上流社会”。而罗维德尔先生则认为这位客人是个相当年轻的瘦高个，有几次他一个人来，有几次和勃罗姆小姐一起回来。在过去两年中大概来过八、九次，“这只是我注意到的来访者，至于那些我没有注意到的来客，当然，我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下午跟卡塔琳娜核对口供，要她对这问题表态时，哈赫还没有想好怎么提出问题，而只是试图婉转地启发她，问她：是否来访的客人就是她有时带回家来的那些绅士时，卡塔琳娜一听见这个问题，顿时满脸通红；出于羞耻和愤怒，她尖锐地反问说：招待客人是否被禁止的呢？由于她不愿意接受他出于好意而伸出的友谊之手，也可能是她根本没有了解到人家的好心。为此，哈赫也变得尖刻起来，告诉她说，她应该明白，大

家现在正在调查一件很严肃的案件，也就是路德维希·戈顿的案件。他的事件已经扩大，警察和检察官追查这个案件已有一年多了。说到这里，他问她，她显然不拒绝的这个来访者，是否就是同一个客人呢；这时巴埃兹曼纳则粗暴地插嘴说："这么说，您认识戈顿已经有两年罗！"

这一个推断使卡塔琳娜惊讶得竟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是望着巴埃兹曼纳摇摇头。当她后来终于以令人吃惊的温和口气吞吞吐吐回答说"不,不是的,我昨天才认识他"时,显得不是很有说服力。现在人们就开始要求她对这个来访者加以说明,但她却"相当慌张"地摇摇头,拒绝在这方面作出什么口供。这时候,巴埃兹曼纳变得又象父亲般地对她说：如果她有一个男朋友,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他不纠缠她而是很体贴她就行——在这里,巴埃兹曼纳恰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心理学上的错误；他又说：她已经离婚了,用不着再有保持忠诚的义务,如果非强求性的体贴有时会带来物质上的收益,这并不是件什么坏事。——于是他犯了第三个决定性的错误。这下可终于惹恼了卡塔琳娜·勃罗姆。她拒绝继续再进行供述,坚持要求把她关进牢房或送她回家。巴埃兹曼纳竟然温和而疲惫地宣布派一名官员送她回家，这使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这时已经是二十点四十分了。当她站起身，拿起她的手提包、盥洗用具袋和塑料袋时，他却又非常突然而粗暴地对她说："你那位温柔的路德维希夜里是怎么从屋子里跑出去的？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看守着——您一定知道有一条通道，而且告诉了他；我非得把这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再见吧！"

二十

送她回家的是默丁，巴埃兹曼纳的助手。根据他后来报告

说，当时他很为这位年轻妇女的处境担心，怕她出意外；她精疲力竭，完全垮了，而且使人感到意料之外，因为在这种处境下，她表现得相当诙谐，也许，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这样的可能。当他开车从城里经过时，他开玩笑地问她，如果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心里无所牵挂地在某个地方喝一杯，而且跳跳舞，不是挺好吗。她点点头表示赞同，而且说，这倒真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好呢。后来车开到公寓门口时，他表示要把她送到楼上她的住房去时，她嘲弄地说："啊哟！你最好还是别送吧，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已经有够多的绅士客人了——但是，当然，我还是应该感谢您的。"

默丁花了整个晚上，还有半个夜间，企图向巴埃兹曼纳证明，为了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安全起见，应该把她拘留。可是当巴埃兹曼纳问他，是否他爱上了她时，他回答说，不，他只是很喜欢她，而且她跟他同年，但是他不相信巴埃兹曼纳认为卡塔琳娜跟某个重要的秘密集团有牵连的论断。

至于他没有报告的，而后来布洛纳通过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才知道的是：当他伴送卡塔琳娜从走廊走向电梯时，他给了她两个不轻易提出来的忠告，这对他讲来是付了很高的代价的，对他以及他的同事们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当他把卡塔琳娜送到电梯口时，他对她说："您一定不要接电话，明天也不要看报纸。"在这里，他并没说清楚，究竟是不要看《日报》，还是泛指一般的报纸。

二十一

那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将近十五点半的时候，布洛纳在他的休养地，正准备作第一次滑雪，打算进行

一次比较长的远足。但是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盼望已久的休假却成了泡影。他们到达这里之后不久，他和特罗德在雪地里散步了两个钟头。在晚上作一次这样的长距离的散步是很愉快的。之后，他们坐在烧得旺旺的壁炉前喝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开着窗子睡得很香。休假开始后的第一顿早饭拖得很晚。饭后的两个钟头，他们身上裹得厚厚地在阳台上的藤椅里坐着。就在这一刻，当他正要打算出发时，来了《日报》的那位记者。这家伙直截了当地就向他谈起卡塔琳娜，问他是否认为她有犯罪的可能。"怎么"，他回答，"我是律师，我可知道，哪种人才会犯罪，难道卡塔琳娜会犯罪？卡塔琳娜？不可思议。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您从哪儿听到这消息的？"当他最后听说，有一个长期被通缉的匪徒在卡塔琳娜那里过夜，而且她本人从早上将近十一点开始一直在受到严厉的审讯时，布洛纳真想立刻坐上飞机回去，帮她的忙。但是这位《日报》来的家伙——这个人是否当时看起来就是这么卑劣，还是他到后来才觉察到这一点的呢？——却说，事情还不至于糟糕到这个地步，并要求布洛纳对卡塔琳娜的性格发表一些意见，而当他拒绝这个要求时，这家伙却认为，对卡塔琳娜的性格不表示意见，就会是一个很坏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引起很糟糕的误解；再说这关系到"头版新闻"的问题，无疑就是暗示卡塔琳娜的性格很恶劣。布洛纳听后非常恼火，激愤地回答说："卡塔琳娜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冷静。"但是说完他就很懊恼，因为他这样说，简直是辞不达意，根本不能表达他原来想要说和必须说的话。他还从来不曾和报纸，当然更不曾和《日报》打过什么交道。当这个家伙坐上他的汽车离开后，布洛纳脱掉了他的滑雪鞋，很显然，他的休假告吹了。他上楼去找特罗德，她正盖得严严地还在阳台上的阳光下舒适地半睡着。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

叫他“赶紧打电话”，于是他试着打了一下，但是三次，四次，五次，所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人接”。在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有人接。那晚上他喝了许多酒，睡得很不好。

二十二

星期五早上将近九点半的时候，布洛纳情绪恶劣地准备吃早饭，特罗德把《日报》递给了他。卡塔琳娜出现在报纸第一版上，大幅的照片，大字的标题：“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供述绅士客人们的问题”。下面是正文：

通缉了一年半的强盗和谋杀犯路德维希·戈顿，昨天如果不是他的情人——家庭助理员卡塔琳娜·勃罗姆消灭了他的踪迹，掩护他逃跑的话，差点落网。据警察局推测，该勃罗姆长期以来即已卷入这个犯罪集团云云。

（请续看本报末版题为：《绅士客人们》的报道）。

在这篇文章里，布洛纳读到，《日报》把他对卡塔琳娜发表的意见“聪明而冷静”改成了“冷酷而有心计”；把他关于她是否有犯罪可能的意见改成了“她完全可能犯罪”。

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师提供材料说：“我相信勃罗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她的父亲是一个隐瞒身分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由于我的恻隐之心有一段时期让她当清洁工，可是她却偷窃教堂的弥撒酒，和她的情夫

在圣器室里胡作非为。”

两年以来勃罗姆一直有绅士客人按期来访。她的住所是否就是一个强盗窝，聚会处，甚至是武器转运站呢？一个才二十七岁的家庭助理员怎么可能有一套价值十一万马克的私人住房呢？是否她用了赃款里的钱呢？警察局正在继续追查。检察官正在努力调查。请看明日报道。《日报》在跟踪追击！全部背景新闻将在明天的周末版刊出。

下午，布洛纳在飞机场的时候，他回忆了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事件：

十点二十五分，吕定极为激动地打电话来，恳求我立刻回去跟那位处于同样非常激动状态的阿洛依斯联系。据说，阿洛依斯正要去贝台立依浴场跟一些基督教企业主开一个会，在会上他得作一篇重要报告，并主持讨论，但他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从来不曾碰到过的，对我讲来简直是难以相信。

十点四十分时，卡塔琳娜来电话，问我《日报》上所刊载的那些话是否真是我讲的，我很高兴，正好可以向她作一下解释。我把前后经过都告诉了她，她（就我记忆所及）这样对我回答：“我信任您，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可知道了，这些混蛋是怎么干的。今天上午他们甚至还去找了我的在生重病的母亲，还有布莱特罗和另外一些人。”当我问她，她现在在哪儿时，她回答说：“在埃尔丝这里；我马上又要去受审讯了。”

十一点，阿洛依斯来电话。这人我认识已有二十年之久，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和害怕。他要我立刻就回去，要我作为他的律师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件。他现在必须去作报告，然后跟那些基督教的企业主们共餐，之后又要主持讨论会，参

加一个不定期的碰头会，但在七点半到九点半之间他可以到我们家来，然后再去参加那个会。

十一点半的时候，特罗德也认为，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帮卡塔琳娜的忙。这时我又在她脸上看到了那种带有嘲弄意味的微笑，看来她已经（或许，只是跟平时一样）对阿洛依斯所碰到的困难有了某种相当确切的看法。

十二点一刻的时候，登记了飞机票，整理了行李，结算完账目。在短短四十小时的休假后又坐上出租汽车，回到埃因斯去。那里的机场上十四点到十五点一直有雾，只能等着。我对特罗德一直谈着卡塔琳娜；特罗德知道，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卡塔琳娜的。我们还谈到，我们经常鼓励卡塔琳娜不要这样拘泥，劝她忘记不幸的童年以及不愉快的婚姻，还曾经企图克服她在金钱问题上的骄傲，打算从我们的存款中借钱给她，利息比银行低，甚至还向她解释，如果她付给我们9％而不是14％的利息，这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而她就能省下许多钱，但是就连这一点也不能说服她。我们是非常感谢卡塔琳娜的：自从她不声不响地，亲切地而且有计划地管理我们的家务以来，不仅我们的开支大大降低，而且还使我们两人可以无牵无挂地放心去工作，对这些，用金钱是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的。她把我们从杂乱无章中解放了出来，这种混乱五年来一直干扰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将近十六点半，由于雾一点没有减轻，我们便决定乘火车。由于特罗德的建议，我没有给阿洛依斯·斯特劳布莱德去电话。我们坐了出租汽车到车站，竟然还买到了十七点四十五分开往法兰克福的车票。真是艰难的旅行啊——胸中作恶，神经紧张。特罗德甚至也非常严肃而又激动，她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灾祸。我们精疲力竭地在慕尼黑换车，总算搞到了卧

铺车厢。一路上两人担心着卡塔琳娜，同时对吕定及斯特劳布莱德感到很气恼。

二十三

星期六早上他们到达城里的车站，全城还沉湎在节日的欢乐中。而他们却沮丧而又痛苦地一下车就在月台上看到了《日报》，标题仍然是卡塔琳娜，这一回登的是卡塔琳娜由一个穿便服的刑事警察伴同着正走下警察局台阶的照片："杀人犯的情人仍然执迷不悟！对戈顿的去向只字不露！警察时刻准备着！"

特罗德买了一份报纸，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坐在出租汽车里一言不发。到家特罗德开门的时候，布洛纳付钱给司机，这位司机指着《日报》对他说："您也在里面，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是这个小娼妇的律师和主人。"布洛纳给了他一笔很大的小费，于是这位司机的微笑就完全不象他说话的声音那样带着幸灾乐祸了，他甚至还把箱子、提包、滑雪鞋等一直拿进过道里，然后很友好地说："再见！"

特罗德煮上咖啡，到浴室去洗澡。客厅的桌子上放着《日报》，旁边是两份电报：一份是吕定打来的，另一份是斯特劳布莱德打来的。吕定那份的内容是："您没有同我联系，很令人失望。吕定。"斯特劳布莱德那份上写的是："不可理解，你竟然对我不闻不问。等你马上来电话。阿洛依斯。"

这时正好是八点一刻。平时这正是卡塔琳娜给他们准备好早饭的时候；她总是铺上桌布，上边放着鲜花，洗得干干净净的餐巾，各种面包，还有蜂蜜，鸡蛋和咖啡，以及专为特罗德准备的烤面包片和橙子酱。

特罗德把咖啡壶和一些麸皮面包、蜂蜜、黄油拿出来的时

候，几乎感伤地说："不会再恢复从前的那个样子了，不会了，他们会把这个女孩子给毁了，不是这些警察，就是这份《日报》。如果《日报》对她不再感兴趣，光是这些人也会把她毁掉的。你来，先读一下这个，然后再打电话给这些绅士客人吧。"于是他读到了下边的文章：

一贯竭力向读者作广泛报道的《日报》，得以进一步搜罗了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她的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正身患重病的勃罗姆的母亲。她起先埋怨她的女儿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望她，之后，面对着不可辩驳的事实，她又说："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被勃罗姆恶意离弃的前夫，老实的纺织工人威廉·布莱特罗热心地为《日报》提供了许多细节。"现在，"他抑制住即将流出的眼泪说，"我才懂得，为什什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要抛弃我。这就是从前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普普通通的幸福生活不能使她满足。她想到外边去找高级的生活，而一个诚实俭朴的工人怎么能搞到一辆小汽车呢。也许（他聪明地补充说），您能向《日报》的读者转达我的忠告：对社会主义的虚假理解，其结果必然如此。我要问您和您的读者们：一个女佣人怎么会成为这样的财主？她是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得到这些东西的。现在我可知道了，为什么她的激进的和反教会的思想一直叫我感到害怕。我感谢上帝有意没有赐给我们孩子。此外，我还懂得了，她为什么不要我的纯朴的爱，而宁愿去爱一个杀人犯，一个匪徒，这件事正好作了说明。尽管如

此，我还是想告诉她：我的小卡塔琳娜，要是你当时一直跟我在一起，在几年中也是会富裕起来的，也会有一辆小汽车；然而我献给你的决不会是一辆小汽车，而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不信任工会的工人所能奉献的那种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唉，卡塔琳娜哟！"

布洛纳在末一版用红边框出的一栏里还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标题：《退休老夫妇感到惊愕，但却无意外之感》，内容是：

退休中学校长贝尔特哈尔特·海彼茨博士及爱尔娜·海彼茨夫人对于卡塔琳娜·勃罗姆的行为感到吃惊，然而并不觉得"非常意外"。在莱姆古，《日报》的工作人员在海彼茨夫妇已婚的管理着一所疗养院的女儿那里采访了他们。这位古语言学家和史学家海彼茨说，勃罗姆在他那里工作了三年，他认为："这个各方面都很激进的人物，狡猾地欺骗了我们。"

（布洛纳后来打电话给海彼茨，海彼茨发誓说，他只说了下面的话："如果要说卡塔琳娜是个过激派，那么她在乐于助人，做事细致和聪明各方面是过激的——对于她，我也许是看错了，不过我有四十年的教育经验，极少有判断错人的时候。"）

上接第一版的是：

《日报》乘格曼斯布洛希鼓笛乐团彩排的时候去采访了这位心碎了的勃罗姆的前夫，他转过身去，以不让人见到他的泪水。如老农梅夫尔斯所说，其他的团员，也以厌恶的心情疏远卡塔琳娜，认为这个人性

格很特别，而且老是装得那么贞洁傲气。一个诚实工人在狂欢节的和平欢乐，受到了干扰。

最后刊载的是布洛纳和特罗德在花园里游泳池旁的照片。标题是：《从前一度以红色的特罗德而闻名的夫人以及她的经常自我标榜为'左派'的丈夫扮演了什么角色。高工资工业律师布洛纳及其夫人特罗德在别墅的游泳池畔》。

二十四

在这里，出现了回溯的形式，也就是在电影和文学作品里被人称之谓"倒叙"的手法：从星期六早晨布洛纳夫妇非常沮丧而失望地中断休假回来，回到卡塔琳娜又被提审的星期五早晨。这次来的是普莱丝女士和一个年岁较大的轻装备的官员；而且不是从她自己的住所，而是从沃尔特斯海姆的住所把她带走的。卡塔琳娜是在清晨将近五点钟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到她那里去的。女警察并不掩饰她知道不是在卡塔琳娜自己家里，而是在沃尔特斯海姆那里可以找到卡塔琳娜。(我们不应该忘记，再一次地想想布洛纳夫妇所作的牺牲以及所遭到的困难：假期的告吹，乘出租汽车到埃因斯飞机场，在雾中等待，乘汽车到火车站，火车开到法兰克福，然后在慕尼黑转车，在卧铺车厢里担惊受怕，清晨刚回到家，一眼就看到了《日报》，后来——当然是太晚了——布洛纳很后悔，在他从《日报》来的那个家伙那里得知卡塔琳娜正在受审讯后，没有替卡塔琳娜打个电话给哈赫。)

星斯五参加卡塔琳娜第二次审讯的还是全班人马——默丁，普莱丝，检察官柯尔顿博士和哈赫，以及记录员安娜·洛

克斯特。这位秘书对勃罗姆在语言文字上的敏锐，感到厌烦，把卡塔琳娜这种态度称之谓“愚蠢”。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这一天心情异乎寻常的好。他搓着手来到审讯室，招呼卡塔琳娜，而且由于自己“有点粗暴”而向卡塔琳娜表示歉意，说这不是由于他的职务，而是由于他个人的关系，他是一个不大文明的粗汉，说着他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被没收的东西的清单。那是：

（一）一本小小的已经磨损的绿色笔记本，里面有许多电话号码。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个本子显然卡塔琳娜已经用了有十年之久了。一位字体鉴别专家，他是被请来审查其中有无戈顿的笔迹的（戈顿的罪名之一是联邦国防军的逃兵，他曾经在军队机关里工作过，所以留下了许多笔迹），称赞卡塔琳娜的书法简直可以用来作字帖。这个女孩子，在十六岁时记下了格尔贝肉铺的电话号码，十七岁时写下了医生克洛顿博士的号码，二十岁时是菲耐姆博士家的号码，后面是各种饮食店、饭店和同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二）储蓄存款处的账目摘要。在这上面每一笔转账或销账都清清楚楚，在本子的边上有勃罗姆的亲笔签字。存款，取款都很精确；出入的款项中没有一笔是值得怀疑的。这摘要与她自己的账本以及各种票据和通知单是相符的，这些单据都夹在一个夹子里，里面还有她由于购置“临河雅寓”那套房间而与哈夫特克斯事务所来往的账单。至于有关她的纳税申请，纳税清单，以及交付的税收单据，都作了仔仔细细的查核；这工作由一位簿记专家进行。他没有发现有任何一笔“较大的不太清楚的款项”。巴埃兹曼纳特别重视检查最近两年来，也就是他诙谐地称作“绅士客人”时期的卡塔琳娜的经济收支情况，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所能发现的是：卡塔琳娜每月给母亲一百

五十马克。还有是她请库依尔地方科尔特事务所定期修理在格曼斯布洛希的父亲坟墓的款项。她的家具开支，家庭日用品开支，以及服装、内衣、汽油等开支，一项一项经过查阅，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漏洞。当这位专家把账本单据交还给巴埃兹曼纳的时候，说："真行呀！等到她获得自由后，如果要找一个工作的话——请给我打个招呼。大家都一直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找不到。"勃罗姆的电话账目也一点没有可疑的地方，显然她几乎没有打过长途电话。

还值得注意的是：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哥哥柯尔特当时因犯了盗窃罪关在监狱里，她有时候也接济他一些零用钱，大概是十五到三十马克。

至于教会税，她是不付的。从她的账本里可以看出，她从十九岁的时候，也即从一九六六年起，就脱离了天主教会。

（三）一本小的笔记本。里面记的是各种不同的收支账目，一共有四栏：一栏是布洛纳家的日常家用费和洗涤用品以及洗衣房等支出。从中可以知道，卡塔琳娜是自己烫衣服的。

第二栏是海彼茨的家庭开支，记着相应的项目和金额。

再下面是勃罗姆自己的家庭开支。很清楚，她的开支显然很少。有几个月她购买食品的生活开支大约三十到五十马克。她没有电视机，显然常常去看电影，经常买一些巧克力，甚至是带馅的巧克力。

第四栏的内容是有关勃罗姆的额外工作的一些开支与收入，涉及到的是购置和洗濯工作服的费用以及大众牌汽车的费用等等。这里，在关于汽油费用的问题上，巴埃兹曼纳用一种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客气的口气向卡塔琳娜提出了问题，问她，为什么她的汽油费用这样大。而这笔费用与她汽车的里程表上标志着相当惊人的巨大数字是一致的。可以计算出来，到

布洛纳家来回的路程大约是六公里，到海彼茨夫妇家大概是八公里，到沃尔特斯海姆女士那里大概是四公里；如果打宽一点计算的话平均每周外加有一次额外的外出工作，也算得松一点，每次算它二十公里，那么每天分摊到大约三公里，这样一算，每天大约是二十一公里到二十二公里的路程。在这里应该考虑到，她并不是天天去看望沃尔特斯海姆的，可是大家对这一点并不计较。这样计算的话，每年大概有八千公里。她，卡塔琳娜·勃罗姆，两年前从厨师克洛尔默接过这辆大众牌汽车时，在文字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那时是56,000公里。现在加上2×8,000公里，那么她现在里程表上的数字应该是72,000公里左右，可是现在的实际数字却接近102,000公里。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有时她要去看望她的母亲，最初是到格曼斯布洛希，后来是到库依尔的霍赫萨克的疗养院；有时还要去看看关在监狱里的哥哥。可是不管是到格曼斯布洛希还是到库依尔的霍赫萨克，来回大约五十公里，而去她哥哥那里大约六十公里；要是每月算她去看一次，打宽一点的话，算她去两次，再说，她的哥哥才关了一年半，这之前一直和她妈妈一起住在格曼斯布洛希，不管这些，就按照两年计算，应该再加上四千到五千公里。这样算下来，也还有二万五千公里的路程没法解释或者说没有着落。那么她常常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是否她也许是在几个地方——在某个地方跟某个人见面呢？

当巴埃兹曼纳以温和的声调作这番统计时，不只是卡塔琳娜·勃罗姆自己，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着迷甚至惊讶。巴埃兹曼纳在算给她听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勃罗姆并不感到生气，而只是表露出由于吃惊和迷惑而引起的一种复杂的紧张表情，因为在他说话的时候，她并不打算解释这二万五千公里的去向，而是自己在苦思苦想：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理由，

她曾经开车出去过呢？当她坐下来受审讯时，出于意料之外地，她变得不太冷漠，甚至有点“温柔”起来，还有点畏惧的感觉，也肯喝茶，而且不坚持自己付钱了。现在，巴埃兹曼纳的问题已经提出，计算也已经完毕，据大多数人，几乎所有在场的人说，当时是死一般的寂静，仿佛大家感到，根据这个极易为人忽略的汽油费的计算问题，人们已经真正进入到了勃罗姆的内心秘密深处；而她的生活，审查到现在为止，是非常清楚的。

“是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说；从现在开始，她的供词记录了下来，就如现在存档的这样：“这是肯定的。现在我很快地在头脑里算了一下，每天差不多有三十多公里。关于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没有计算过汽油费，但是我经常开车出去兜风，纯粹是兜兜风，毫无目的，也就是说，开到哪里算哪里——也就是说，我开往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目的地；往南就是柯勃伦茨，往西就是阿亨，或者一直开到莱茵河下游。然而并不是天天如此，我说不出来多少天间隔多久才出去一次。但是多半是在下雨天，或是空闲的夜晚，而且总是单独一个人。这里，我说得更确切点，每当下雨，我总要开车出去兜兜风。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说不清楚。您们应该明白，有时候，我不去海彼茨那里或是没有临时的额外工作的时候，五点钟就可以回到家里，但是无事可做。我不想老到埃尔丝那里去，特别是她跟康拉德接近之后。至于一个妇女单独到电影院去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有时候，我到教堂里去坐一会儿，这不是出于信教的原因，而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安静。但是即使在那儿也还是得听着那种出自非世俗人之口的时髦的胡说八道。当然，我也有几个朋友，例如，凡尔纳·克洛尔默，就是从他那里我买了大众牌汽车，还有他的夫人，以及克洛夫特饮食店

里的别的一些职工，不过如果单独一个人去，而且不是没有限制地，说得确切些，不是无条件地要去发现或是寻找合得来的人，那是很麻烦而且非常拘束的。所以我就干脆坐上汽车，打开收音机，开车出去，常在公路上跑。这经常是在下雨的时候，我最喜欢驶过两边种着大树的公路，有时候一直开到荷兰或者比利时，在那里喝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后再回来。是的，因为您问起我，现在我才想起来。至于，如果您要问我，多少时间去一次，那我可以说，每月大概有二、三次，有时候少一些，有时候多一些，每次得几个小时，常常要到九、十点钟，有时甚至将近十一点钟时才累得半死地回到家里。我看到一些单身的妇女在晚上喝醉了酒看电视，就感到很害怕。”

巴埃兹曼纳以温柔的微笑听取了这个解释，然而在思想里他究竟怎么想却不得而知。他只是点了点头，又一次搓了搓手；他这样做，是因为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口供证实了他的一条理论。室内有片刻一片沉寂，仿佛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或是有点尴尬。看起来，似乎勃罗姆第一次从她的内心深处暴露了一些什么秘密。由于这个缘故，对于另外一些查抄的东西的解释很快地就过去了。

（四）一本贴着许多人物像片的照相册。这上面是些什么人是很容易查对出来的。有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父亲，带着病容，一副苦恼的样子，看起来远比他实际年龄大得多。有她的母亲，她已确诊患着癌症，正在死亡的边缘上。还有是她哥哥的照片，以及她自己的，卡塔琳娜四岁及六岁时的像片，卡塔琳娜十岁时举行坚信礼时的像片，二十岁时新婚的像片。再就是她丈夫的像片，格曼斯布洛希地方的牧师，邻居，亲戚，以及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的各种像片，然后是一个一开始认不出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看起来富有活力，后来证明就是那位

正在服刑的审计师菲耐尔博士。没有任何一张像片上的人物是跟巴埃兹曼纳的理论挂得上钩的。

（五）一张旅行护照，上面的名字是卡塔琳娜·布莱特罗，娘家姓勃罗姆。由于护照就问到了关于旅行的问题，从而证实卡塔琳娜至今还没有“真正旅行”过，除了有几天生病之外，她一直是在工作着。在菲耐尔和布洛纳处工作时，他们付给她休假费，可是她不是继续工作就是去做临时工。

（六）一只用旧了的巧克力匣子，里面装的是信，一共十来封，有她母亲的、哥哥的、丈夫的，还有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没有一封信可以证明跟她现在所蒙受的嫌疑有任何关联。此外，在这只巧克力匣子里还有几张她父亲在德国国防军里当上等兵时的像片，她丈夫穿了鼓笛乐团制服照的像片，还有几张已经破损了的上面印有谚语的日历纸，一本范围相当广的、手抄的特殊烹调法汇编，一本《用雪莉酒做调味汁的方法》的平装本。

（七）一个文件夹子。里面装着各种材料：毕业证书，执照，离婚证明以及与她的私人套间有关的各种文件。

（八）三串钥匙。经过检查，这都是住房及柜子上的，一串是她自己家里的，一串是布洛纳家里的，另一串是海彼茨家的，都没有疑问。

有一点是确定的，而且也在记录上记了下来，即在上述查抄的各项物件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可以怀疑的。而且卡塔琳娜·勃罗姆对于汽油费和她汽车行驶里程的解释，也被默认了。

可是正在这一瞬间，巴埃兹曼纳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镶有一圈钻石的红宝石戒指。显然他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在拿给卡塔琳娜看之前，他已用上衣袖子把它擦得闪闪发亮。

“您知道这只戒指吗？”

“知道。”她一点不犹豫和窘迫地回答。

“是您的吗？”

“是的。”

“您知道它值多少钱吗？”

“不太清楚，值不了多少钱。”

“是这样，”巴埃兹曼纳友善地说，“为了郑重起见，我们不仅请了我们这里的行家，而且还请了城里的珠宝商把它作了估价。这只戒指的价值大约在八千到一万马克之间。难道您不知道？这一点我甚至可以相信您，然而您必须向我说明，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涉及到调查一个作案的强盗，这个强盗还有着杀人的嫌疑。这样一只戒指可不是一件小事，也决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譬如说开几个小时的汽车在雨中兜几百公里圈子之类。究竟这只戒指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呢？是从戈顿还是从那些绅士客人那里得来的？如果戈顿跟你的绅士客人不是一码事的话——允许我说句笑话，那么你就在雨中开车出去，跑上成千里去当别人的女客人，是这样吗？我们本来不难确定这只戒指是从哪一个珠宝商那里买来的或是偷来的。可是我愿意给您一个机会。我不认为您直接参予了犯罪，而只认为您幼稚以及有点过于浪漫。您怎样向我，向我们解释您是以贞洁、甚至是腼腆出名的呢。在您的熟人和朋友中间，您的外号叫‘尼姑’，您连唱片音乐会都不去，嫌那里太粗野。由于您的丈夫对您‘纠缠不清’，因而您离弃了他——您怎么解释，前天您才认识这个戈顿，而就在这同一天——可以说是紧跟着，您就把他带到您的住所，而且很快就在那儿——诺，我们说——跟他打得火热。您对这该怎么解释呢？这是一见倾心吗？是爱上了他？是对他温柔？难道您不知道，这里面有些地方是不利于消除嫌疑的吗？这里还有这个。”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个白色的

大信封，从中又拿出一个一般大小，但是有着很特殊的紫罗兰颜色的信封，里面有浅黄色的衬里，“这个空信封是跟这只戒指一起在您的床头柜里找到的，信是七四年二月十二日十八点在杜塞尔多夫车站邮局发出的，信上是您的地址。我的老天啊，”巴埃兹曼纳果断地说，“如果您有个朋友，他有时来拜访您，您有的时候也开车去看望他；他给您写信，有时还送东西给您——那您就痛快讲出来，这并不犯法。只是因为与戈顿有关，才把您牵连了进去。”

所有在场的人都清楚，卡塔琳娜是认得这只戒指的，可是并不知道它的价值；这里重新又碰到了绅士客人这个难题。是否因为她看到这事会损害她的名誉，或者会损害到某个她不愿使他卷到这事件里来的人，所以才这样忸怩呢？这次她的脸只是稍为有点红。她不承认这只戒指是从戈顿那里得来的，是否因为她知道，把戈顿说成一个花花公子，根本不能令人相信？当她让人在供认记录上记述下面这些话时，她一直很平静，几乎可以说是“温顺”：“事实是，我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庭舞会上，单单只跟路德维希·戈顿亲切地跳了舞；这个人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也是在星期四早晨被警察局审讯时才听说。我感到他很温存体贴，他也喜欢我。将近十点时我离开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家，和戈顿一起乘车到了我的住所。

“关于首饰的来源，我不能说，说得更正确些，是我不愿说，因为它不是通过不法行为才归我所有的，为此我感到没有义务要解释它的来源。至于寄信给我的人，我并不认识，想来是一个普通的送货样的。在烹饪的专业圈子里有些人是认得我的。一般送广告的不写自己的地址姓名，而且常用很贵重的而且垫有很厚的衬里的信封。有关这一事实，我就用不着多说。只是有一点我要指出的，一些食品商店是很喜欢讲究外观的。”

当人们问她，她既然如此明确地承认喜欢开车出去，那么为什么偏偏在那天她事先就算计好坐电车去参加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呢？卡塔琳娜·勃罗姆回答说，因为她不知道，她会喝多少酒，为了保险起见，就没有开自己的车子。又问她，是否她喝得很多，有时要喝醉时，她回答，不，她喝得很少，她没有喝醉过，只醉过一回，那是当着他丈夫的面，由于他的劝诱，在鼓笛乐团成员的晚会上被灌醉了，喝的是一种味如柠檬水的茴香酒。据别人后来告诉她，人们经常用这种价格相当昂贵的饮料来灌醉人的。当人们责问她说，她的这个解释，所谓怕喝醉，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她从来也没有多喝过。是否她不了解，事情看起来就仿佛她跟戈顿是约好的，所以知道不用开自己的车，而是坐戈顿的车回家。但她摇摇头说，事情的经过就如她所说的那样。那天她是打算痛痛快快喝一通的，但是却并没有那样做。

中午休息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得到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她不但没有一本储蓄本而且也没有一本支票簿。是否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什么账本呢？不，除了储蓄处的账本外，她没有任何其他的账本。每一项，即使是最小的一笔可以归她使用的款项，她都立刻用来偿付她的利息很高的贷款了；贷款的利息有时几乎是储蓄利息的一倍，而活期户头几乎根本就没有利息。此外支票往来对她讲来花费太大而且麻烦也多。日常的花费，家庭开支，汽车费用，她都是付现金的。

二十五

一定的阻塞，也可以称之谓“紧张”，是免不了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水源都可以一下子疏通转移方向而使排干后的地面显

露出来的。可是不必要的紧张我们都应该避免。这里需要交待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巴埃兹曼纳竟然和卡塔琳娜同样地和气，几乎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温顺，而卡塔琳娜却反而有点害怕和畏缩呢。那一天，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一个友好的邻居把一份《日报》塞到了她家的门缝底下。这份《日报》在这两个女人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恼恨和激动，她们感到羞耻和恐惧。然而和布洛纳马上通了电话以后，这种情绪就有所缓和。但是就在这两位吃惊的女人刚翻阅了一下《日报》，卡塔琳娜刚和布洛纳打过电话，普莱丝女士就出现了，她坦率承认，卡塔琳娜的住所当然是受到监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知道可以在这里找到她，而现在抱歉的是，包括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在内，都得去接受审讯。由于普莱丝女士的坦率而友好的态度首先冲淡了《日报》引起的恐惧感，而在卡塔琳娜眼前又浮起了昨晚上的经历，这使她感到幸福。原来路德维希给她打了电话，是从那边打过来的！他是那样亲切，因而她根本没有向他讲起她遭到的烦恼，因为不应该叫他也担忧，他是这种烦恼的起因之一。他们也没有谈爱情之类的话，这是当他们坐在汽车里驶回家去的时候，她就禁止他讲的。不，不，她一切很好，当然最好她能在他身边就更好，永远地或者至少长时期地在一起，当然最好是永远永远地在一起，她度过狂欢节将休息过来，除他之外永远不跟任何一个其他男人跳舞，除了和他跳南美洲舞外就不跳别的任何舞。他在那边怎么样呢？他过得很不坏，什么都不缺。至于她阻止他谈爱情，他还是想向她说，他非常非常喜欢她，有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他还说不好，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再过一年或者两年——他将会接她去，到哪儿，他还不知道。他们就象两个彼此怀有极大温情的人那样在电话里讲了诸如此类的话。没有说一点亲密贴心的话，也没有提到

那件事，也即巴埃兹曼纳（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哈赫）曾经用如此粗鲁的话讲过的那件事。他们讲了以上这一些话。说的是两个彼此体贴的人所能说的话。讲得相当长，足有十分钟。卡塔琳娜告诉埃尔丝说，也许十分钟还不止呢。至于这两个温顺体贴的人所用的具体的词汇，人们可以在某些现代的电影中听到。在这些电影里，常常是相隔很遥远的距离，在电话里讲了许许多多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卡塔琳娜和路德维希两个人所通的电话，也正是使巴埃兹曼纳变得轻松、友好、温和的原因。虽然他推测到，为什么今天卡塔琳娜一点也不再表现得冷漠倔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当然不会猜想到，他今天这样高兴也是由于这个同样的原因，虽然不是出自相同的理由（人们应该把这件值得注意和深思的事件作为经常打电话非必要时绝不说知心话的一个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对某个人的电话交谈感到兴趣）。巴埃兹曼纳也知道，卡塔琳娜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还知道另有一个匿名的人给卡塔琳娜打电话。

对于这一节泄露机密的消息，请读者不要按照来源去追根问底。这只是说明掘通了一个次要的停滞的水潭，它所筑起的非正式的堤坝被沟通了，因而，在不坚实的整个堤坝破裂之前，在全部阻力消失之前，水就流了出来，使积水得以流动。

二十六

但是不要因此产生误会，必须承认，不管是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还是布洛纳，当然知道，卡塔琳娜有可能被判罪，因为她帮助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的住所逃了出去。当她帮助他逃走时，她就成了某种罪行的同谋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未必

是真正的犯罪！在普莱丝女士带她们两个去受审讯之前，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就直截了当地对卡塔琳娜讲到了这个问题。而布洛纳则抓住时机，也叫卡塔琳娜注意，由于她的行为，她可能要遭到惩罚。至于卡塔琳娜对沃尔特斯海姆女士讲到戈顿时所说的话，也不应向任何人隐瞒；她说："我的上帝，他恰恰正是我所喜爱的人，我要和他结婚，而且生孩子；如果需要我等待的话，不管多少年，我要一直等到他从监狱里出来。"

二十七

对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审讯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她只要准备随时跟沃尔特斯海姆家庭舞会上的其他参加者对质就行。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这对于巴埃兹曼纳所猜测的，是有预谋或搞阴谋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究竟路德维希·戈顿是怎样到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庭舞会上来的呢？

卡塔琳娜·勃罗姆被允许回家，或是在一个她认为合适的地方等待。但是她拒绝回去；她说，她的住所使她很厌恶，她宁可在一间小屋里等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审讯完毕后和她一起回家。卡塔琳娜在等待的时刻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日报》来读，而且问，是否国家（她是用这个字眼来表达的）在这种肮脏的行径面前毫无办法保护她，并使她重新恢复被败坏了的名誉呢？她知道得很清楚，审讯她是完全正当的，即使她并不理解为什么要问得那么详细，甚至问到了"生活里面最细小的情节"。但是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审讯里的一些细节——例如绅士客人问题——《日报》是怎么会知道的呢？还有这些捏造的和诈取的口供。这时候，检察官哈赫插言说，那是由于大家对戈顿事件有极大的兴趣，因而报纸上就得报道出来。再说，到现在为

止，还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但是由于卡塔琳娜使戈顿逃走所引起的震动和恐惧，就免不了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了。此外，由于她跟戈顿认识，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大家感兴趣的对象了。至于新闻报道里某些带有侮辱性或诽谤性的地方，她可以对此提出控诉。如果发现检察机关内部有什么"不够严密"的地方，那么，请放心，检察机关会对此提出控告，帮助她保持她的权利的。随后，卡塔琳娜被带到了一间小屋里，撤去了严密的监视，只派了一个年轻的女助理警察名叫雷娜特·苏达赫的，没有携带武器，一直跟她呆在一起。据这个女助理警察后来报告说：在这整整两个半小时之内，卡塔琳娜·勃罗姆什么旁的事也没有干，一直反复读着这两张《日报》。请她喝茶，吃面包，她都拒绝了，不过并不是以一种抗拒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差不多是友好的却又是冷淡的"方式。雷娜特·苏达赫屡次想法转移卡塔琳娜的注意力，跟她谈论有关时装、电影、舞会的事情，但是卡塔琳娜都没有接口。

为了帮助卡塔琳娜，因为她一头扎在《日报》的报道文章里出不来，雷娜特·苏达赫临时请同事汉夫顿替班，自己到档案处去拿来了一些别的报纸的报道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关于勃罗姆所受到的牵连，对她的审讯，以及她所可能起的作用，都以实事求是的口气作了报道。有的只在第三第四版上登一些短文，这些短文甚至连勃罗姆的姓名都没有完全写出，只说是某个卡塔琳娜·勃，一个家庭助理员。例如《周报》，只占十行篇幅，当然更没有什么像片，文章里讲的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受到了不幸的连累。雷娜特·苏达赫一共给勃罗姆看了十五份剪报，但是，这并不能安慰她，她只是一股劲地问："有谁看这些呢？我所认识的人看的都是这份《日报》！"

二十八

要搞清戈顿是怎样到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庭舞会上来的，首先得审问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本人。在接触的最初一刹那就很清楚，这位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对所有在场参加对她审讯的全体人员，如果不说是抱有敌对情绪，至少比起勃罗姆来可以说更为敌对一些。她的供词如下：她生于一九三〇年，现年四十四岁，未婚，职业是家务管理员，没有文凭。在她谈到正题之前，她以一种“比起破口大骂或大喊大叫更能表达愤怒的冷淡而近于干涩的”声调谈到了《日报》对待卡塔琳娜的行为，以及有人把审讯时的一些细节提供给新闻界的事实。她说，她很清楚，卡塔琳娜所起的作用是应该受到审查的，可是她倒要问问，是否要象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要“把一个年纪轻轻的生命给毁掉”，这样做是否够负责任。她从卡塔琳娜诞生的那天起就认识她，现在却眼看着她正在被毁掉，从昨天起她就注意到她所受到的打击。她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卡塔琳娜明显地对那个她曾经如此喜欢，为了它长期辛苦工作的住所不再感到兴趣这个事实，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要想打断沃尔特斯海姆的滔滔不绝的控诉是非常困难的。巴埃兹曼纳几次三番想打断她，却都没有成功，而当他好不容易总算把她打断，并责备她接待了戈顿时，她就发誓说，她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没有作过自我介绍，也没有人把他介绍给她。她只知道，在这个出事的星期三将近十九点半时，他是由海塔·舒梅尔陪同来的，一起来的还有舒梅尔的女朋友克劳迪亚·史坦姆，而后者的同伴却是一个装扮成酋长的男人；这人她只知道名叫卡尔，此人后来的举止行动很奇怪。跟戈顿确实

不是事前约好的，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对于卡塔琳娜生活里的每一细节，她都可以说得出来。当有人把卡塔琳娜“古怪的开汽车兜风”的事问她时，她就不得不承认，关于这问题她并不知道，这下子她自己对自称了解卡塔琳娜全部生活细节的断言给了狠狠的回击。当问到有关绅士客人的问题时，她有点尴尬，回答说，由于卡塔琳娜对这个问题没有作任何说明，所以她也拒绝答复。对此她唯一能说的是：这是件“相当低级的事情”，“而我所谓的低级并不是指卡塔琳娜，而是那位来访的客人。”如果卡塔琳娜授权给她的话，她倒可以把她所知道的事全部原原本本讲出来的。至于卡塔琳娜开车到这位客人那里去，她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的，确有这样一位先生，不过，她之所以不想多说到他，只是不想使他成为笑料而已。卡塔琳娜不论是在戈顿，或是绅士客人的事件上，她都是清白的。卡塔琳娜一直是一个勤劳的，有头脑的，有点儿腼腆的，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女孩子。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非常虔诚，后来她那在格曼斯布洛希的教堂里当清洁工的母亲干了几次不规矩的事情，有一次当她正和教堂里的杂役在圣器室里偷喝一瓶弥撒酒时，给当场抓住了。这行为于是被夸大成“放荡行为”，甚至变成了一件丑闻，从此卡塔琳娜在学校里就受到牧师的虐待。是的，卡塔琳娜的母亲勃罗姆太太性格无常，有时还要酗酒，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卡塔琳娜的父亲在战争里变成残废后，一直生病而且总是抱怨，她的母亲是很苦的，还有那个可以说是不成器的哥哥。卡塔琳娜还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她曾经劝过卡塔琳娜，不要跟这个布莱特罗结婚，因为他（她请求原谅她用下面的名词来表达她对他的看法）是个典型的假仁假义的人，他对世俗和教会的机构都同样地拍马屁；他还是个讨人厌的告密者。她认为卡塔琳娜

之所以早婚，目的是脱离可怕的家庭环境，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旦她摆脱了这个环境和解除了这个不谨慎的婚姻以后，她的发展是很好的。她的专业能力是无可置疑的；她，沃尔特斯海姆不只是口头这样说说，必要的话还有文字可以作证。她自己是手艺工会的考试委员会的成员。随着私人和机关团体请客方式的变化，现在愈来愈倾向于采用一种人们称之谓“有组织的小宴会”的形式，这就使象卡塔琳娜·勃罗姆这样的妇女得到大大发挥能力的机会；这样的妇女有组织能力，又会计算经济，还具有各种审美方面的教养。但是现在，如果她不能使《日报》恢复她的名誉，那么随着她对住所失去兴趣的同时也就会失去她对自己职业的兴趣。在有一个问题上，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受到了训斥。他们对她说，对于“新闻界登载的那些肯定歪曲了的报道进行刑事上的追查”，这不是警察或检察机关的事。新闻自由是不能轻易侵犯的，可是沃尔特斯海姆却可以相信，个人起诉是合法的；针对那些不合法的新闻来源，可以向某些人提出控告。年轻的柯尔顿博士，在这里，几乎可以说是慷慨激昂地为新闻自由及新闻秘密发表了一通辩护词，他强调指出，谁要是不搞品质恶劣的社交活动或者不置身其中的话，新闻界就绝对不会想到要对谁作出粗暴难堪的描述。

戈顿的出现，以及不祥的化装成酋长的卡尔的出现，这一切可以让人推测到在社交活动方面的极端轻率从事。这样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预计在审讯那两个惊惶的或有牵连的姑娘时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证明。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受责备是理所当然的，谁让她不好好挑选一下她的客人呢。但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对此很不服气，这一个年轻先生竟然教训起她来了。她回答说，她邀请了这两个姑娘，而且允许她们带她们的男朋友一起来，可是她怎么能要求看她们带来的朋友的身份证明和品行

鉴定书呢？于是她马上受到了斥责，而且要她注意，在这里，并不是年龄，而是检察官柯尔顿博士的职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家正在这里调查一件严重的、相当棘手的、当然也不能说是最棘手的暴力刑事案件，而显然戈顿是与这个案件有关系的。她应该让国家的代表来决定，哪一些细节，哪一些解释是正确的。他们再一次地问她，戈顿和绅士客人是否就是同一个人，可是沃尔特斯海姆却回答说，不是，这一点是绝对可靠的。可是当人们再进一步追问，她是否认识这位“绅士客人”，或是看见过他，碰到过他时，她却不得不加以否认。由于她对这样一个重要有关隐私的细节，就象对值得注意的开车兜风一事一样一无所知，因而对她的审讯很不满意，后来就“恶声恶气”地暂时让她走了。在她离开这间屋子之前，她非常恼怒地对着记录嚷起来说，这个化装成酋长的卡尔，在她看来至少同戈顿一样可疑。他曾经在厕所里不断地喃喃自语，而且后来就不告而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十九

下一个审讯的是把戈顿带到舞会上去的一个十七岁的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她显然很害怕，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她对她和戈顿的相识作了比较可信的解释。她供述:“我和我的女朋友克劳迪亚·史坦姆一起住在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的公寓里。她在一家巧克力工厂做工。我们两人都来自库依尔的奥夫特斯布洛希，因而我们两人和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卡塔琳娜·勃罗姆都沾点远亲（虽然舒梅尔打算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她们的远亲关系，她讲了她的祖父母，祖父母的表弟兄，表姐妹，但是人家请她不用这样详细叙

述，只要用"远亲"这个词表达就足够了）。他们管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叫姑姑，而把卡塔琳娜看作是我们的表姐。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三晚上出事的那天中午，我和克劳迪亚两人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们已经同埃尔丝姑姑讲好，要带着我们的朋友去参加这个小小的节日活动，否则舞伴就会不够。可是我的男朋友是在联邦军队里服役的，确切地说：他是工兵，正巧又被派了值内勤，虽然我劝他溜之大吉，但他却没有被我说服，因为他已经溜过不止一次，很怕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而克劳迪亚的男朋友从中午起就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我们不得不把他弄到床上去躺着。因此，我们决定到波尔克特咖啡馆随便找两个伙伴带去，因为我们不想在埃尔丝姑姑面前丢脸。咖啡馆里正象狂欢季节的情景，人们在跳舞的前后，聚会的前后在那里碰面，在那里肯定可以找到很多年轻人。波尔克特咖啡馆在星期三午后就已经充满着节日的可爱的气氛了。我曾经两次被一个年轻人邀请跳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人叫路德维希·戈顿，是一个被通缉的要犯。在跳第二次舞的时候，我问他，他是否乐意和我一起去参加一个舞会，他立刻高兴地答应了。他告诉我，他正在旅途中，没有住的地方，还不知道该在哪儿消遣这个夜晚，因此很愿意和我一起去。在我和戈顿这样约定的时候，克劳迪亚和一个装扮成酋长的人在我们旁边跳舞，他们想必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因为这个酋长——后来听说，他名叫卡尔——立刻就用一种谦卑而滑稽的方式问克劳迪亚，是否他也可以去参加这个舞会，他也很孤独，也同样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度过这个夜晚呢。这样一来，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大家都坐上路德维希——我指的是戈顿先生——的汽车，开往埃尔丝姑姑的住所。那是一辆波尔舍牌汽车①，四个人坐着挺不

① 这是一种车厢比较窄小的跑车。

舒服，但好在路不远。至于问到卡塔琳娜·勃罗姆是否知道我们上波尔克特咖啡馆去找舞伴，我的回答是，她是知道的。那天早晨我曾打电话给正在布洛纳律师那儿上班的卡塔琳娜，告诉她，如果我们找不到人的话，就得单个儿去赴会了。我也曾对她说起，我们打算到波尔克特咖啡馆去物色舞伴。她表示很不赞成，认为我们太轻信也太轻浮。卡塔琳娜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古怪。因为出乎我意料之外，卡塔琳娜一见戈顿立刻就把他占有了，同他跳了一夜的舞，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

三十

克劳迪亚·史坦姆的回答差不多和她的朋友海塔·舒梅尔的供述完全一样。只有在一个非原则的问题上有些出入，就是她和卡尔酋长跳了三次舞而不是两次，因为在海塔被戈顿邀请跳舞之前，她就已经被卡尔邀请跳过一次舞了。对于以冷冰冰出名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竟然与戈顿一见如故，甚至于这样亲密，她也表示很惊讶。

三十一

参加这次舞会的成员中还有三个人被提审。独资经营的布商康拉德·巴特斯，五十六岁，是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朋友；还有海特维希和格奥尔格·泼洛顿夫妇，前者三十六岁，后者四十二岁，两人都是机关职员。这三人对于那晚上的经过都作了同样的描写。他们讲到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到来，讲到海塔·舒梅尔在路德维希·戈顿伴同下出场，而克劳迪亚·史坦姆则由装扮成酋长的卡尔陪同下来到。除此之外，这整个晚上过得

很好，大家跳着舞，彼此聊着天，而其中卡尔又表现得特别诙谐。格奥尔格·波洛顿说，但令人不安的是“卡塔琳娜·勃罗姆完全为路德维希·戈顿所占有了”——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们自己肯定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致使这个夜晚显出一种严肃，甚至是很庄重的气氛，这和狂欢节日的活动似乎有点不相称。海特维希·波洛顿夫人还说，在卡塔琳娜和路德维希刚走，她去厨房拿冷饮的时候，看见这个装扮成酋长的卡尔在厕所里喃喃自语，紧接着这个卡尔也就不辞而别，消失了影踪。

三十二

再一次提审了卡塔琳娜·勃罗姆。她承认，海塔·舒梅尔曾经和她通过电话。但她仍然否认她和戈顿是事前约好的。不是巴埃兹曼纳，而是较年轻的检察官柯尔顿博士，逼她承认，在她跟海塔·舒梅尔通电话后，她就打电话告诉戈顿，狡猾地叫戈顿到波尔克特咖啡馆去，和舒梅尔搭讪上，然后可以不令人注意地跟她在沃尔特斯海姆家碰头。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舒梅尔是个相当时髦，令人注目的金发女郎。但是卡塔琳娜·勃罗姆只是无动于衷地摇了摇头。她坐在那里，还是象先前那样右手紧紧拿着两张《日报》。当她被宣布释放后，她就和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她的朋友康拉德·巴特斯一起离开了警察局。

三十三

当大家讨论审讯记录，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漏洞时，柯尔顿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应该认真地把名叫卡尔

的那个酋长抓到手，把他在这事件里所起的相当暧昧的作用调查一下。可是叫他感到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措施要缉捕这个"卡尔"。如果这个卡尔不是和戈顿一起在波尔克特咖啡馆里出现的，那也是同时混进这个舞会里去的。在柯尔顿看来，卡尔这个角色不说可疑，至少也是不清楚的。

于是在所有在场的人们中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甚至连一向很能抑制感情的女警察普莱丝也微笑起来。记录员安娜·洛克斯特女士笑得简直不可收拾，以致巴埃兹曼纳不得不对她进行了叱责。可是柯尔顿却还是摸不着头脑，最后他的同事哈赫只能对他进行解释，问他是否还不清楚或者还在奇怪，为什么刑事总管巴埃兹曼纳故意忽略或不提这个酋长？很显然，这个酋长是"自己人"，所谓在厕所里喃喃自语，无非是用袖珍步话机向跟踪戈顿和勃罗姆的伙伴发消息（当然干得是不够机灵的），而在这段时间里勃罗姆的地址自然是早已调查出来了。"当然罗，您很清楚，同事先生，在这个狂欢节日里，装扮成酋长是最好的伪装，因为今年由于明显的原因，化装酋长比化装牧人更要风行得多。""当然，"巴埃兹曼纳紧接着说，"这之前我们就已经预计到，趁这狂欢节日的机会，这匪徒可以很方便地溜掉，追踪他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三十六小时以来我们一直是紧跟着他的。戈顿没有化装，他在停车场上的一辆大众牌大轿车上过了一夜，后来又在这停车场上偷了一辆波尔舍牌小汽车，然后到一家咖啡馆里吃了早饭。在这家咖啡馆的盥洗室里他刮了脸，换了衣服。我们对他简直一分钟也没有放松过，差不多有十多名装扮成酋长、牧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工作人员，他们随身都带着袖珍步话机，有的还伪装成喝醉了酒，从跳舞会回家去的醉汉，这些人对他进行了跟踪，发现他同谁接头就马上报告。直到戈顿进波尔克特咖啡馆之前，所有他接触过的人我们都掌握

而且作了调查：

“一个酒店侍者，在这个人的柜台上他喝了啤酒。

“两个姑娘，他在旧城饭店跟她们跳过舞。

“近郊木材市场的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他在这个加油站给他那辆偷来的波尔舍牌汽车加了油。

“马太街售报亭的一个男人。

“烟店的一个售货员。

“还有一个银行职员，在这家银行里他兑换了七百美元；这些钱可能就是他从银行抢劫来的。

“和所有这些人的接触显然是偶然的，不象事先有什么计划，他同其中任何人的交谈都不象含有什么秘密暗号。可是我可不相信，他和勃罗姆的会见也是偶然的。她与舒梅尔通过电话，后来，舒梅尔准时带他来到了沃尔特斯海姆家，以及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亲热而温情地跳舞，后来，又双双地一下子溜掉了，这一切都说明不是偶然的。首先要看到这个事实，她表面上说他是不告而别，其实很明白，她给他指点了一条逃出住宅区去的通道，而避开了我们的严密监视。我们对整个住宅区，也就是说，对她居住的这个住宅区的这所公寓，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监视。当然，我们没有能对这大约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全部面积进行监视。显然她知道有一条出路而且告诉了他。此外，我还可以确定她给他——也可能还给别的人——找到了住的地方。她一定很清楚，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她的雇主家里已经被搜查过。我们还派了调查人员去她的老家，而对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住所，趁她在这里受讯期间，我们再次作了彻底的检查。什么也没有。在我看来，最好还是让她自由行动，这样便于她去犯错误。也许这样一来，又会使我们发现这位不吉利的绅士客人的住所的线索。我敢肯定，她所指引的住宅区的通

道是由于布洛纳夫人的缘故才知道的，因为这个至今为我们所公认的“红色的特罗德’，她曾经参予了这个住宅区的设计。”

三十四

到此为止，第一次的倒叙算是告一段落，人们又从星期五回到星期六了。为了避免继续发生阻塞以及水势满溢的情况，已经想尽了办法。但看来要全部避免却还是不太可能做到。

有一点也许要说明的，星期五下午审讯结束后，卡塔琳娜·勃罗姆让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康拉德·巴特斯一起伴送她到家而且再三请求他们一起上楼。她承认，她是在害怕。她说在星期四晚上，她刚和戈顿通过电话之后，(任何一个局外人，就她公开地，尽管不是在审讯时，讲出她和戈顿有电话联系，就应该承认她的无辜！)就发生了一些相当可怕可厌的事情。就在她和戈顿通了电话之后，刚把听筒挂上，电话铃立刻又响了起来。她当时抱着“强烈的希望”，以为也许还是戈顿，马上拿起了听筒，可是电话里并不是戈顿的声音，而是一种“轻得可怕的”男人声音，对她用“几乎是耳语般的”声音讲着“下流的话”、低级的事，而最坏的是，这个家伙竟然冒充是个住户，而且对她说，如果她真是如此需要体贴，何必从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关系呢，他随时准备着而且也能够给她任何类型的体贴。就是这个电话，使得她那天晚上跑到埃尔丝的家去。她很害怕，甚至害怕接电话，可是她没有戈顿的电话号码，而他却有她的，她很希望再接到戈顿的电话，同时又怕接电话。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讲讲勃罗姆碰到的另外一些可怕的遭遇。首先要讲的是她的信箱，直到现在为止，这个信箱在她的生活里只起到了极其微小的作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她只是

"象别人所做的那样"，走过时顺便看它一眼，里边往往是空的。可是在这个星期五的清晨，它却装得满满的，但是一点也不能给卡塔琳娜带来愉快。因为，虽然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巴特斯想方设法要把那些信件和印刷品统统截走，可是她还是冷静地抱着想获得一些有关亲爱的路德维希的消息的希望，把所有的邮件——大概总共有二十多件——统统看了一遍，看到显然没有路德维希的信件后，就把它们一古脑儿塞进了她的手提包。她在乘电梯的时候又经受了一次痛苦，因为有两个住户正好也上楼。其中的一个（这里必须得讲讲，尽管这听来是不可信的）是装扮成酋长的绅士，他靠角落站着，故意与卡塔琳娜保持着距离。还好，到四层楼时，他就出去了。另外一个是女的，装扮成安达卢西亚人（听起来似乎是在发疯，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脸上戴着假面具。她不但不躲开卡塔琳娜，反而挨她站着，用她那双"厚颜无耻的、无情的、褐色的眼睛"，放肆而好奇地打量着卡塔琳娜。她到第八层楼才出去。

可是得警告读者：还有更坏的事情呢。当最后卡塔琳娜依傍着巴特斯和沃尔特斯海姆女士进到自己的屋子里时，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抢在卡塔琳娜之前，飞奔过去拿起听筒，立刻她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脸色变得苍白起来，然后就听见她喃喃地骂："您这只该死的猪，该死的不中用的猪。"她机灵地没有把听筒再搁上，而是丢在一边。

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巴特斯想阻止卡塔琳娜看那些邮件，可是没有用。她牢牢地拿着那一大堆信件和印刷品，还有那两张《日报》，这些都是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来的，她坚持要拆开来看。真是毫无办法。那就只能让她看吧！

这些信件也不全是匿名的。其中最厚的一封是非匿名信，自称是"亲密邮购商店"寄来的，建议供应她各种性用品。这

对卡塔琳娜的情绪来讲，简直是莫大的刺激。更坏的是，还有人亲手写了下边这样的话："这些是真正的温顺体贴。"

为了简单一些，或者说，为了作一下统计，那其他十八封信是：

七封匿名明信片，充满了"粗鲁"的有关两性的脏话，而且使用了常用的"××党母猪"这个词。

另外四封匿名明信片写的不是关于两性的脏话，而是些政治上的辱骂话，从什么"红色的煽动者"直到"克里姆林宫姑奶奶"等等都有。

还有五封是从《日报》下选出来的剪报，有些地方用红笔在旁边作了批注，其中有这样的话："斯大林办不到的，你也办不到。"

另外有两封信的内容是宗教的劝诫，都附有宗教的箴言："可怜的迷途的孩子，你要重新学会向上帝祈祷。"还有是："下跪吧！要相信，上帝还没有抛弃你。"

正在这时候，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发现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她幸运地瞒过了卡塔琳娜。纸条上的内容是："你为什么不利用我的温顺体贴目录呢？难道我得强迫你去获得你的幸福吗？曾经为你无礼拒绝的邻居。我警告你。"笔迹用的是印刷体。看了这些字迹，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相信，这个人假使不是受过医学教育，至少也得具有大学水平。

三十五

卡塔琳娜走到房间的壁橱前面，从里边拿出雪莉酒、威士忌酒、红葡萄酒各一瓶和一瓶打开过的樱桃酒。她并不怎么激动地把这些酒瓶往洁白无疵的墙上掷去，瓶子被打得粉碎，酒

顺着墙壁流下来。在她这样做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康拉德·巴特斯都不感到奇怪。他们只是看着，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去进行任何的干涉。

她在厨房里也干了同样的事。在那里，她把蕃茄汁、沙拉油、醋和辣酱油都同样地往墙上掷去。这里有没有必要补充说说，她在浴室里把擦脸油膏和瓶子，还有香粉，肥皂粉，以及在卧室里把一瓶科隆香水也全都掷掉的呢？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很有计划，并不激动，显得这样自信坚定，因此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康拉德·巴特斯一点也没有加以阻拦。

三十六

当然，曾经有相当多的理由试图猜测分析，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卡塔琳娜产生了谋杀的最初意图，或者说有了谋杀的计划，并决定把这计划付之实施的。有些人设想，星期四《日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就足够了。也有的人认为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日报》还在没完没了地继续刊载这事件的文章，而卡塔琳娜的邻居以及她这样喜欢的住所都证明受到了骚扰（当然是主观上的），如：匿名的电话，匿名的信件。然后又是星期六的《日报》。此外还有（这里预先提提！）《日报星期日版》。其实，这么多的推论全是多余的。反正她计划了谋杀而且果真实施了，这就行了！反正这是肯定的：她心里“冒火”；特别是她的前夫的话更使她生气。至于《日报星期日版》上的文章，即便没有起引发的作用，却也绝没有起安心的作用。

三十七

在结束这一段倒叙，回到星期六之前，我们还得再报道一下，卡塔琳娜是如何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家度过星期五的夜晚直到星期六的。总的说来，她是出奇地安静。康拉德·巴特斯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开始放跳舞音乐，甚至还放了南美的舞曲，想让卡塔琳娜跳舞，但却没有成功。他们想阻止她看《日报》和那些匿名信件，但也没有做到。他们试图开导她，说这一切并不是如此可怕而且正在过去，但她同样听也不听。他们对她说，她已经忍受过了很坏的遭遇，如：艰苦的童年，和那个卑劣的布莱特罗的婚姻，母亲的酗酒癖以及"她的逐渐堕落，她应该对柯尔特的犯罪负责"。还有，戈顿不是已经获得了安全，答应接她去，跟她正式结婚吗？现在不是正在过狂欢节吗？在经济上不是也有保障的吗？再说，哪儿还找得到象布洛纳夫妇、海彼茨夫妇这样的好人呢？至于那个"虚荣的傻瓜"——大家都不想提这个绅士客人的姓名——难道不只是一种可笑的而不是什么令人发愁的现象吗？这时候，卡塔琳娜接口了，她指出，这"愚蠢的戒指和花哨的信封"已使他们两人处在极为狼狈的境地，甚至使路德维希受到了嫌疑。她怎么会想到，这个傻瓜竟然会为了他的虚荣心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不，不，她可不觉得他可笑。简直一丝一毫也没有。当他们和她谈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好比说，是否她应该另找一处新的住所；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到哪儿去找等等——她都不回答，只是说，她打算要做的唯一实际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缝一件狂欢节穿的衣服。她向埃尔丝借一条大床单，因为当时流行装扮酋长，所以她自己也准备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出发"时化装成一

个阿拉伯女人。当时是否曾经出现过什么不好的情况呢？一点也没有，如果人们更留心些的话，甚至还可以说，当时的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卡塔琳娜终究碰到了"注定要来的那个人"，而且和他"过了一夜"，好吧，现在她受到了查问或者说受到了审讯，那么，很显然，路德维希不是"一个花花公子"。只是《日报》上登载了一些流行的肮脏话，有两个混蛋打了匿名电话，还有一些人写了几封匿名信。就这样，难道生活就不再继续下去了吗？路德维希不是已经十分妥贴地——而且就她一个人知道——被安置得舒舒服服了吗？现在我们还是来缝这件狂欢节的衣服吧！卡塔琳娜穿上它看起来娇媚得简直象穿了件白色的女式大披风；她将穿着它非常可爱地"出发"。

最后，自然要求行使它的权利：人们睡着了，然后打个盹，醒过来，之后又打起盹来。是不是大家一起喝一小杯酒吧？干吗不呢？这是一幅真正的安宁的景象：一个年轻的妇女，在缝衣服的时候睡着了，一对年龄较大的男女小心翼翼地在她周围行动，以便让"自然获得它的权利"。自然的要求满足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凌晨两点半钟响起的电话铃声都没有把她闹醒。为什么清醒着的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拿起听筒的时候，她的手突然发抖呢？是否因为在两个小时以前她已经接过一次这样的匿名电话，现在正在等待着呢？自然罗，在凌晨两点半打电话，是令人很不安的。但是她拿起了听筒，巴特斯立即从她手里接了过去，当他刚说"喂"的时候，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打过来，甚至当他拿起听筒还没有说"喂"，对方就又立刻挂断了。当然有那么一些人，当他们从《日报》上读到了什么人的名字，知道了这人住在哪里以后，他们就企图折磨这个人的神经，因此，为了妥当起见最好不要把听筒再搁上。

本来他们两人打算至少不让卡塔琳娜看到星期六的《日

报》，可是就在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正在睡觉，康拉德·巴特斯正在浴室里刮脸的一转眼间，她就溜到了街上，在晨曦中把她碰到的第一只《日报》的报箱打开了，而且，干下了一件渎神的行为，因为她蔑视了《日报》社的信任，从中抽出了一份《日报》而没有给钱。到此为止，就得把倒叙的过程暂时停顿一下，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正好在这个星期六，布洛纳夫妇衣服凌乱，情绪激动，而且很愁闷地刚从夜车上下来，意外地买到了这版《日报》，这就是他们后来在家看的那份报纸。

三十八

这个星期六的清晨，对于布洛纳夫妇说来，是很不愉快的。这不只是由于在卧铺车厢里度过了颠簸震动很厉害的失眠的一夜，也不只是由于《日报》的关系，布洛纳夫人是这样谈论这张报纸的：这种瘟疫追逐起某个人来，是会追遍全世界，令人不得安宁的。说不愉快，也不只是由于收到了两封带谴责意味的电报，它们是有很大影响的友人及“吕斯特拉”公司的同事发来的，同时也由于哈赫的缘故。他们一早就给他打来了电话（但这也太晚了，如果他们在星期四给他打电话就好了）。哈赫不很友好，他说，对卡塔琳娜的审讯已经结束，他没有把握，是否会对她提出公诉；目前她肯定很需要帮助，但还不需要法律上的帮助。他还说，他们是否忘记了现在正在狂欢节期间，而一个检察官也有权利要过一个休息日的夜晚，以及难得碰到的狂欢节的吧？他们毕竟已经相识有二十四年之久，曾经同窗读书，一起击剑，一起唱歌，甚至一起徒步旅行，现在不必把一瞬间的恶劣情绪看得这样严重，再说他们自己也一样感到特别不痛快。后来——从检察官这一边——提出了要求，即：其他的一

切最好面谈，不再在电话里说了。事情就是这样，她有嫌疑，有些问题还不大清楚，不过也没有什么别的，或者下午面谈时再说吧。可是在哪儿碰头呢？在城里，最好是边走边谈。十六点半，在博物馆的回廊那里见面。这之后，又打电话到卡塔琳娜的住所，给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给海彼茨夫妇，但都没有人接。

不愉快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缺少了卡塔琳娜勤快的双手而一下子很清楚地显露出来的迹象。虽然他们不过做了些咖啡，从柜子里拿了些干面包、黄油和蜂蜜，把两件行李放到了过道里，在半个小时之内屋子里就弄得乱七八糟了。最后，甚至特罗德也冒火了，因为布洛纳一个劲地问，从哪里她看出了卡塔琳娜的事件和阿洛依斯·斯特劳布莱德甚至和吕定有关系。可是她却完全不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用她一贯爱用的故意装出来的天真嘲讽方式指着《日报》，问他是否特别注意到一个词。她的这种冷嘲热讽的方式，在平时他是很欣赏的，可是在这一个清晨却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当他问她是哪个词时，她以嘲弄的口气拒绝告诉他。她说，她想考验考验他的观察力，于是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读"这种脏东西，这种该死的脏东西紧跟着人跑遍全世界"。他读得很不专心，因为报上伪造的他的讲话以及"红色的特罗德"一直使他很恼怒，最后他不得不认输，忍气吞声地请特罗德帮他忙。他对她说，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观察力不行了，再说几年来他一直只从事工业律师而没有当过刑事律师的职务。于是特罗德干巴巴地说："可惜啊！"但接着她又显露了同情心，回答他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绅士客人这个词吗？你没有注意到，我曾经把它和电报联系在一起过吗？谁会把这个戈顶——错了，是戈顿，你可看看他的像片——从他的衣着来说，谁会把他看作一位绅士客人呢？这是不可能的，

可人是吗？这样的一个人在那些甘当特务的住户们嘴里只能用男客人这个词。我马上可以变成一个预言家，并且告诉你，至多在一小时之内，这位绅士客人就要上我们这儿来；此外我还可以向你预言：还会产生许多烦恼和冲突——也可能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会告终，还要生你的红色的特罗德的气，比对卡塔琳娜生的气还要大。卡塔琳娜身上有两个危险的素质：老实和骄傲。她永远也不会承认，她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了逃跑的通道，而这个通道是我跟她一起共同研究过的。冷静点，我的亲爱的，保持冷静。这事是不会败露的，可是这位戈顶，错了，是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能从她的住所逃得无影无踪，严格讲来我是有责任的。你一定已经记不得了，我曾经在我的卧室里挂了一幅“临河雅寓”的全部暖气管、通风管、下水管及电线管的图样。在那上面，暖气管用红色，通风管用蓝色，电线用绿色，下水管道用黄色标明。这张图样曾经使卡塔琳娜如此神往——她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有条理的、有头有脑的，可以说是有组织才能的人物——她常常站在这幅图样前面，不断地问我关于这幅“抽象画”——她是这样叫它的——上面的各种联系及含意。我差一点想画一个副本送她，幸好，我并没有这样做。你可以想：如果在她那里发现了图样的副本的话——那么有预谋的理论，转运站的设想，就完全可以成立了，于是从红色特罗德就可以联系到匪帮，再联系到卡塔琳娜和绅士客人。这样的一幅图样，对各色各样的小偷强盗和私通的人讲来是极为理想的指南，可以不被人发现地进进出出。我还曾经向她讲过其中几条通道的高度。遇到水管漏水或者电线出了问题进去修理时，哪儿可以直着走，哪儿可以弯着腰走，哪几个地方又得爬着走。就这样，由于这条通道才使这位年轻可爱的君子有可能逃脱警察的追捕，而她现在还在梦想着他的温情。如果他真是一个银

行抢劫犯的话，那么他对这一整套装置是很在行的。说不定这位绅士客人也是这样走进走出的。这种新式的公寓房子不同于老式的出租楼房，需要完全不同的监视方法。你得向警察和检察官们顺便暗示一下。他们监视了主要的出入口，可能还加上走廊和电梯，但是他们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用的电梯，直通到地下室——从那里只要匍匐行走几百米左右，随便掀起一个下水道的盖，一下子就能溜出去。你可以相信我说的话；现在剩下的就只能求助于祈祷了，因为他现在不在乎《日报》上登载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标题，现在他急于要直接操纵调查和调查报告的提出。对他讲来，和报上的标题一样可怕的是那一位玛特的忧愁而酸涩的脸容，也就是他那位合法的正式结婚的夫人，他和她生了四个孩了。你难道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曾经好多次和卡塔琳娜跳舞，而且总是坚持把她送回家去，还流露出一种近于'稚气的快活'吗？——我不得不说，也许是真正的高兴呢！——后来她自己买了汽车以后，他不是又表现出象小孩那样的失望吗？他所需要的，他的心灵所渴慕的，正是象卡塔琳娜这样的一个尤物。她不轻浮，然而——你们怎么说呢——却还是有爱情的；她严肃，很年轻，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漂亮。她不是也曾经多少使你这颗男人的心感到过喜悦吗？"

是的，真是那样，她曾经使他高兴过，他完全承认，而且也承认，他不止，远远不止是喜欢她。而她，特罗德，也知道，每一个人，不只是男人，有时会产生要拥抱某个人的欲望，甚至会有更多的要求。——可是，卡塔琳娜却不这样，她决不会使他成为她的绅士客人。不过，究竟是什么因素阻拦他这样做呢？——说得确切一些，甚至没有使他产生这样的企图呢？——她知道，也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并不是由于尊敬和体惜她特罗德，而是由于对卡塔琳娜的尊敬。一点不错，是对她

的尊敬，几乎可以说是敬畏；是的，真该死，对她的清白充满了爱的敬畏，甚而至于，除了这清白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东西，他简直找不出言词来表达。也就是说，在卡塔琳娜身上有一种内向的特别冷静的性格——虽然他比卡塔琳娜大十五岁，在生活里也有了一些成就——可是卡塔琳娜又是怎样严谨地组织安排了她的倒霉的生活啊！——这就促使他不能够这样做，即便他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他很怕打扰她或者打扰了她的生活。由于她是如此易受损害，简直十二分地易受损害，如果证实，阿洛依斯真的就是那个绅士客人的话，他将要——直截了当地说——“给他一个耳光”。是啊，大家得帮她忙；对于这种阴谋、查讯、审问，她会不堪负担的——可是现在却太晚了，今天非得把卡塔琳娜找到不可……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的启示性的沉思被打断了，因为特罗德这时候以她无法比拟的干巴巴的声调证实说：“绅士客人坐车驾到。”

三十九

马上就可以证明，事实上布洛纳并没有给这位坐着一辆花哨的出租汽车驾到的斯特劳布莱德一个耳光。在这里，不只应该尽可能少地流血，而且也应该尽可能少地描述对肉体使用的暴力，如果这种描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写报告时有责任把它限制到最少的程度。当然。这意思并不等于说现在布洛纳夫妇变得愉快了一点，正好相反，变得更不愉快了，因为特罗德一边在搅拌咖啡，忍不住以下边的话来对他们的老朋友表示欢迎：“你好啊，绅士客人。”“我认为，”布洛纳狼狈地说，“特罗德又在讲一些有针对性的话了。”“是啊，”斯特劳布莱德回答说，“请问，这样做是否过分呢？”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在布洛纳夫人和阿洛依斯·斯特劳布莱德之间过去曾经出现过相当难堪的紧张关系。虽然他不是诱惑她，却曾经企图对她调情，而她却以极端冷淡的方式让他明白，他自以为别人是难以抵抗他的，可是并非如此，至少在她身上可不是这样。由于有过这种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布洛纳马上就把斯特劳布莱德请进了他的工作室，并请求他的夫人单独留在那里，在此期间（"在什么期间？"布洛纳夫人问），尽量想法把卡塔琳娜找到。

四十

虽然他的工作室里并没有看到灰尘，所有的东西也都在原来的位置，可是，为什么这屋子突然一下子显得这样可厌，几乎可以说是又乱又脏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红皮椅子——过去，在这上面人们曾经顺利地进行过业务谈判，有时作过亲密的谈话，也可以舒适地坐在那儿听音乐——一下子变得这样令人讨厌？就连这些书架也变得使人恶心起来了呢？是什么使得墙上那幅有夏加尔[1]签名的作品显得可疑起来，仿佛它是一幅出自这位艺术家之手的赝品了呢？烟灰缸，打火机，威士忌酒瓶——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对这些不协调的，虽然价值很贵的东西厌烦了呢？为什么在度过了一个特别不愉快的夜晚后对这么一个不愉快的白天是如此不能忍受，而且两个老朋友之间的紧张气氛是这样强烈，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呢？什么原因使得人们竟然反对起四周刷成浅黄色，画上了时髦的流行图案的墙壁来了呢？

① 夏加尔（1887—），法国抽象派画家。

“是啊，是啊！”阿洛依斯·斯特劳布莱德说，“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们帮助了。在飞机场上等雾的时候，你们太紧张了。在你们失去控制或者说失去耐性之后一小时，雾就减弱了。否则的话，你们有可能十八点半就回到这里。甚至到了慕尼黑，你们也一点没有冷静地想到打个电话给机场，不然，你们就会知道，障碍已经消除。不过，不要再去说它了，也不必再说什么假话了——即使没有雾，飞机准时起飞，你也来不及了，因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审讯部分早就结束，再也不会有什么必须避免的麻烦事了。”

“我本来就没有办法和《日报》干架。”布洛纳说。

“《日报》倒没有什么危险，”斯特劳布莱德说，“它掌握在吕定手里。不过还有别的报纸呢。任何一类的标题我都不在乎，唯独把我和匪帮搞在一起可不行。一桩浪漫主义的有关女人的事件，最多给我招来一些私人的麻烦，不至于引来涉及公众的困难。没有和卡塔琳娜·勃罗姆这样富有吸引力的女人照一张相，倒是很可惜的。此外，有关绅士客人的那一套说法总算是中止了，现在麻烦的既不是首饰也不是信件——可不是吗？我曾经送给她一只价值很贵的戒指，这已经给人发现了；我还曾给她写了几封信，现在只让人拿到了个信封。糟糕的是，这个托特格斯可以用化名，把这些在《日报》上不能登载的新闻投稿到别的画报上去——对了——几分钟前我从吕定那里听说，卡塔琳娜已经答应托特格斯进行一次单独访问。吕定是赞成这次会见的，因为《日报》掌握在他手里，可是托特格斯如果通过某一种伪装进行别的新闻业务活动，他对此就没有办法了。看起来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一无所知。”布洛纳回答说。

“这对于一个律师讲来真是少有的情况，而这个律师的委

托人偏偏就是我。原因就在于，在火车上白白浪费了无谓的时间，而没有去问问天气预报，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报告你说，雾很快就会消退的。那么你至今还没有和她有过联系？”

“没有，你呢？”

“没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只知道，大约一个钟点前她曾打电话到《日报》去，约托特格斯明天下午进行一次单独访问。托特格斯答应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加叫我发愁的事，它使我胃痛得厉害。”说到这里，斯特劳布莱德的脸容似乎有些激动，他的话也带点悲伤的声调。“明天起你可以随便怎样骂我，因为我滥用了你对我的信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终究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在这里是允许过自由的爱情生活的；你必须得相信我，为了帮助她，我什么都愿意干，甚至可以把我的名誉孤注一掷，因为——你尽可以取笑我——我爱这个女人，只可惜：已经没法再帮她的忙了——但是还可以帮我的忙——她干脆就不让人帮她的忙。”

“难道你不能帮她去对付《日报》，反对那批混蛋吗？”

“我的上帝啊！你用不着对《日报》这样冒火，虽然它叫你们有点难堪。我们不想在马路新闻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上争论。总而言之，我很希望你作为我和她的律师，能够在这次访问时在场。最棘手的事情直到现在，不管是在审讯时，还是在报上，都还没有透露出来：半年前，我曾把我们柯尔福斯顿海姆别墅的一串钥匙硬塞给她。现在不管在搜查住所还是检查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这串钥匙，要是她没有把它扔掉的话，那么它确实是在她那里，至少曾经在她那里过。你会说，这简直是多情，可我是愿意她有一串别墅的钥匙，因为我总希望，她会到那里去找我。请相信我，我是要帮助她的，甚至想挺身出来承认：瞧吧！我就是那个绅士客人——可是我知道：她会否认的；但

是对待她的路德维希却决不会这样。”

这时，在斯特劳布莱德的脸上露出了一些没有见过的、令人惊讶的表情，差一点引起布洛纳的同情心，至少是激起了好奇心：这几乎近于是一种屈辱。或者难道这就是妒嫉吗？“那么这些首饰、信件和钥匙又怎么样呢？”糟透了，胡贝特，你难道还没有懂得吗？这就是我既不能对吕定也不能对哈赫和警察讲出来的事情——我敢肯定，她把这串钥匙给了路德维希，这家伙两天以来就一直躲在那儿。我担心卡塔琳娜，担心警察，也担心这个可能躲在柯尔福斯顿海姆屋子里的那个愚蠢的年轻粗坯。我但愿在他们发现他之前，他就离开那里；同时也希望，他们把他抓住，就此了结这件事。现在你明白了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你可以打电话到柯尔福斯顿海姆去。”

“那么你相信，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会接电话吗？”

“要不你就得打电话告诉警察，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无论如何要避免发生事故。不得已时你可以打匿名电话。尽管戈顿在你屋子里的可能性极小，你也必须立刻告诉警察。要不然我去干这件事。”

“那样的话，我的屋子，我的名字，不就会跟这个匪徒联在一起登上头版新闻了吗？我在想的是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想，也许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我的意思是去柯尔福斯顿海姆一趟，作为我的律师，到那儿去照看一下。”

“在这时候去？在狂欢节的周末《日报》已经知道我已中止了我的休假——而我这样做的原因，就为了到你的别墅去照看一下？去看看冰箱有没有坏？暖气的恒温器指数是否正常？有没有玻璃被打破？酒是否足够？床上的被单是否充分？就为了这些，一位具有很高名望的、有着一所附有游泳池别墅的和

‘红色的特罗德’结婚的工业律师，竟然从休假中特地折了回来？难道你真认为这是个聪明的想法？那些《日报》的记者先生们肯定在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好比说，我刚下卧铺车厢就到你的别墅去看看番红花是否已经开放？雪钟花是否已经盛开？你想的可真是个好主意——再说你完全忽略了，这位和气的路德维希曾经显示出，他的射击是相当准确的。”

“真他妈的，我不知道，你是在讽刺还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只是请你作为我的律师和朋友，为一件公事服务一下而已。这并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具有公民性质的事件——而你却跟我说什么雪钟花等等的废话。这事件昨天以来变得这样神秘，以致从今天一早开始就得不到那儿的任何消息了。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从《日报》那儿得来的，幸好和吕定关系不错。检察官和警察还从来没有和内政部长通过电话，而吕定正好又和这个部关系很好。胡贝特，这是有关生死的问题呢。”

这时候，特罗德没有敲门，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走了进来，冷静地说：“关系不到死的问题了，谢谢上帝，现在是生的问题。他们已把这个小伙子给逮住了。真笨，他开了枪，但自己也被击中，受了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阿洛依斯，就在你的柯尔福斯顿海姆屋子的花园里，在游泳池和凉亭之间。人们只说这是吕定的一位伙伴的华丽别墅，价值五十万马克。此外，正人君子还真是有的：第一，我们的正派的路德维希说，卡塔琳娜与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纯粹是一件个人的恋爱事件，和刑事犯罪活动没有一丝一毫关系。对于这些加在他身上的罪行，象先前一样，他完全否认。阿洛依斯，也许你得让人修配几块玻璃——当时双方枪击很厉害。你的名字至今还没有被提到，可是也许你应该打个电话给玛特，她肯定很激动而且需要安慰的。同时在别处逮住了三个所谓戈顿的同谋犯。

这一切都被看作是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的辉煌战果。喏，亲爱的阿洛依斯，现在赶紧走吧！为了调剂一下，到你的亲爱的夫人那里去作一次绅士客人的访问吧。”

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布洛纳的工作室里几乎发生了一场非这个环境能适应的混战。据说——只是据说而已——斯特劳布莱德想扼住特罗德·布洛纳的喉咙，可是被她的丈夫挡住了，而且向他指出，无论如何他不能殴打一位太太。斯特劳布莱德——据说——回答说，他真不知道，这样一个刻薄的女人是否能配得上称为太太。有些话，在某些情况下，譬如在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件时，是不能用来讽刺人的。只要他再一次听到这个倒霉的词，那——那就——就——吹了。在阿洛依斯还没有离开屋子，布洛纳还没有来得及叫特罗德走远一点儿的时候，特罗德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卡塔琳娜的母亲晚上去世了，我肯定可以在库依尔的霍赫萨克找到她。”

四十一

在开始最后的曲折离奇的情节之前，请允许在这里加入一段所谓的技术性的插话。这部小说情节太多；其情节之多简直令人苦恼，几乎对它们无法顺利地处理，这是它的缺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幸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管理员，开枪打死一个新闻记者，这样一个事件必须得到解释或者至少应该想法去解释清楚。但是那些有名望的律师为了一个家庭管理员而中断他辛辛苦苦获得的滑雪休假，该怎么解释呢？至于那些企业主（他们还兼任教授和党的头头），出于自作多情竟把别墅的钥匙（还附带他们自己）硬塞给了这个家庭管理员；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两件事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些企业主一方面想把事情公

诸于众，但却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这些事情和人物简直对不上扣，并且不断干扰水的流动（也就是主要情节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所谓不会沾边的人。又怎样解释常常要求窃听，并得到允许去窃听的刑事部门的官员呢？简而言之，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通得过的，然而在关键性的时刻，对于一个新闻报道者来讲，却是通不过的，因为虽然（例如从哈赫和一些警察局的男女公务人员那里）可以打听到这一件或那一件情况，可是他们所讲的绝对没有一件事，没有一句话是实实在在的，即使大体上可靠的也没有，因为他们不会在法庭上供述，也不会在法庭上加以证实。这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对于公众来说是毫无价值的。这整个窃听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当然窃听电话的目的是在调查，但其结果——因为这不是由调查机关而是由另一个部门干的——在公开审判时不仅不能应用，甚至连提都不会提到。首先，这些专门窃听电话的人的所谓心理状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一个无非是履行他的职责的清白的公务人员，会怎样想呢？即所谓不是由于被迫而是出于生计去履行他的义务（也许这种义务正是他所厌恶的），那么，当他不得不窃听，并听到有一个不认识的住户，我们姑且在这里把他叫做柔情的献媚者，给类似卡塔琳娜·勃罗姆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慧的、几乎无可指责的人打电话时，他会怎样想呢？是引起了他道义上的反感，或是挑逗了他的性欲，或者两种刺激兼而有之呢？当有个外号叫"尼姑"的妇女被嘶哑的低语和带有威胁性的献媚的要求伤害了心灵深处的时候，他会不会感到气愤，他会不会产生同情心，还是会把窃听当作一种特别的愉快呢？许多事情是发生在台前的——但是更多的事情却发生在幕后。例如我们有时要提到的吕定这样一个人物，他打电话给《日报》编辑部，比如说："马上把S拿出来，把B放进去。"那么这一位无辜的、仅

仅是辛苦地谋生的窃听者会怎样想呢？当然，吕定的电话之所以被窃听，并不是因为要监视他，而恰恰是因为他有被人——例如那些讹诈者和政治打手之类——暗害的危险。一个清白的窃听者怎么会知道，这里的S指的就是斯特劳布莱德，而B指的就是布洛纳，他怎么会知道，这样一来，读者在《日报星期日版》上看到的就不再是斯特劳布莱德的，而却是大量的关于布洛纳的事情了呢？可是——谁知道或者料想到——布洛纳恰恰正是吕定极为推崇的一位律师呢？这位律师在国内外无数次地证明了他的才智。如果在这篇报道的其它地方提到“互相不能碰头”的源泉的话，这意思就是说，它们就象国王的孩子们那样，由于假尼姑吹熄了蜡烛，以致其中的某个孩子陷入泥沼里，淹死了。[①] 又好比说，吕定夫人让厨娘打电话给她丈夫的女秘书，问吕定在星期日要吃什么点心，是罂粟子蛋糕？还是冰淇淋奶酪草莓，或者只加冰淇淋或者只加奶酪？对此，女秘书不想去打扰她的上司，她是知道他的口味的；也许只是出于烦恼或是为了刁难，她尖着嗓子对厨娘说，她可以肯定，吕定先生在这个星期日宁愿吃杏仁汁什锦布丁。而厨娘自然也是知道吕定的口味的，于是反对说，这可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否女秘书可以确定没有把她自己的口味同吕定先生的口味混淆了呢？是否她可以直接跟吕定先生通电话，问问他到底想吃点什么呢？而这位女秘书，她曾经以会议秘书的身份有机会同吕定先生一起出过差，在王宫旅馆或者国际饭店同他一起吃过东西，因而她强调说，当她同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总是吃杏仁汁什锦布丁的。于是厨娘说，但是星期日他可不是同她——女秘书——在出差，是否就有可能，吕定想吃什么就不一定根

---

① 出自一个童话故事。

据他的社交场合来决定等等。最后还为了罂粟子蛋糕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全部谈话由纳税人付了款并被录上了磁带。于是录音带监听人员听的时候，自然就得很细心地注意，要想想，这里是否用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暗号呢？蛋糕是否就是手榴弹，冰淇淋草莓就是炸弹呢？他们也可能这样想：这些人竟然操心这类事情，或者：我很愿意也有这类事情可操心呢。因为这人也许正巧他的女儿私奔了，或者他的儿子抽大麻上了瘾，或者房租又涨价了，而所以把这一切全录下来，其原因只是由于吕定曾经被威胁过要吃炸弹而引起的。这样，一个没有失职的公务人员或职员就知道了，什么是罂粟子蛋糕，这对他讲来只要能把它当作一顿正餐就很满足了，尽管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能不能把录音带公开放一下呢？以便于了解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康拉德·巴特斯究竟亲密到什么程度。当谈到这两个人的关系时，"朋友"这个字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她称他为宝贝、亲爱的，或者她只叫他康拉德或康尼呢？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口头上的温情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据说他唱歌很有点名气，他有一个很好的、接近音乐会、至少也是合唱队水平的男中音；他是不是在电话里给她唱过歌呢？唱过小夜曲？流行歌曲？咏叹调？或者在电话里用一种粗鲁的方式谈论过去的或未来的亲密关系呢？人们是非常愿意知道这一些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靠的精神感应已经失灵了，于是他们就使用在他们看来比较靠得住的电话。可是上司是否清楚，听了这些会给他的公务人员和职员带来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呢？我们不妨假设有一个当前有嫌疑的又很庸俗的人打电话给他（她）的同样庸俗的恋爱对象，而现在正有人受命对他（她）进行窃听。因为我们

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相互之间可以自由和坦率地说话，在电话里说话也是同样。那么如果一个品行端正的或道德很严谨的人——不管哪一种性别都一样——把这一切听到耳朵里或是从录音带上飘过来时，他会怎样呢？对此是否要负责呢？精神上的照顾是否有保证呢？服务行业、运输业和交通业的工会对此有什么意见？现在人们对实业家、无政府主义者、银行经理、抢劫银行的匪徒和银行职员都很关心，但是谁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家的录音队伍呢？难道教会对此无话可说吗？富尔达主教会议和德国天主教中央理事会为什么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呢？教皇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呢？为什么没有人考虑到无辜的耳朵在这里要负担这种什锦布丁和最难听的色情话呢？现在有些年轻人被召来当公务员——但是他们听谁摆布呢？窃听电话的流氓。在这里，在某个范围内，教会和工会可以合作起来。至少可以为窃听者制订出一套培养计划，给听录音带的人上历史课。这是花费不了多少的。

四十二

抱歉的是现在我们又得回到台前来着手不可避免的沟渠的开凿工作，而且不得不一开始就进行必要的解释！我们曾经有过诺言，不该再让流血的事件发生。我们还要着重指出，勃罗姆太太——卡塔琳娜的母亲——的死，并不是破坏了我们的诺言。她的死，并不是一桩流血的谋害事件，尽管也并非一般正常的死亡。勃罗姆太太的死是由于暴力而引起的，不过这种暴力却不是故意的。无论如何——这是必须确认的——致她于死命的人既没有谋害也没有杀害更没有伤害她身体的意图。使她死亡的人就是那个托特格斯，这不仅已经得到证明，而且他甚

至已经承认了，并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流血的、蓄意使用暴力而致死的结局。托特格斯在星期四到格曼斯布洛希打听勃罗姆太太的去向，得到了她的地址，但是他想闯进她住的医院去，却没有成功。他遭到了门房、护士埃德加尔特和主治医师海能博士的拒绝，因为勃罗姆太太刚动过一次严重的、但是很成功的癌症手术，她需要很好地休息，她的康复全赖于不能激动，因此谈不上同记者会面。托特格斯对医生说，勃罗姆太太由于她的女儿同戈顿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时髦人物”。但是医生反驳说，对他讲来，时髦人物首先还是一个病人。在谈话过程中，托特格斯发现医院里有粉刷匠在工作，后来他向他的同事夸口说，他利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策略，也就是装扮成工匠的策略”——他弄了一件工作服、一个灰浆盆和一把刷子——终于成功地在星期五早晨溜进了勃罗姆太太的病房。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母亲更能提供丰富的资料了，即便是生病的母亲。他同勃罗姆太太核对了事实。他没有把握，她对这一切是否都很了解，因为很明显，她还不知道戈顿。她曾经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而在《日报》上登载时，他把这句话改成：“必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必然会有这样的结局。”为什么要对勃罗姆太太说的话进行这样小小的改动呢，他解释说，作为一个记者，他要更加精确，而且也习惯于“把普通人的讲话说得更清楚些”。

四十三

不能肯定的是，托特格斯是否真的溜到了勃罗姆太太的身边，或者是否为了能在《日报》上登载卡塔琳娜母亲的一些话作为一项采访的成果，于是他捏造了或者说虚构了这次访问，以

便表现记者的聪明或才干，而且还附带可以报道一些东西。海能博士、埃德加尔特护士、一个名叫霍尔娃的西班牙护士、一个名叫庇尔科的葡萄牙清洁女工——所有这些人都并不认为，“这个家伙真会无耻到这种地步以致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海能博士）。不过毫无疑问，这次尽管可能是捏造的、然而却已被承认了的对卡塔琳娜母亲的访问，不只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问题自然就来了，究竟是医院里的人员干脆否认了发生过这种不容许发生的事情，还是托特格斯为了补充卡塔琳娜母亲的说话，而捏造了这次访问。在这里，我们应该绝对地公正。已经可以证明的是，在卡塔琳娜和托特格斯已经约好进行个别访问之后，在《日报星期日版》连续刊登托特格斯写的报道之后，卡塔琳娜自己缝了一件服装，目的就是到那个倒霉的舍纳“带着一个浪荡女人溜掉”的酒店里去进行调查。我们得耐心地等待。可以确定的、已经被证明了的、有根有据的是，海能博士对于他的病人玛丽亚·勃罗姆的突然死亡感到非常惊奇，他对这种“没有预料到的影响既不能加以证明，也不能加以排除”。这里，无辜的粉刷匠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负责的。德意志手工业的荣誉是不容抹黑的。无论是埃德加尔特护士还是外国女人霍尔娃和庇尔科都不能保证，所有的粉刷匠——一共有四人，都来自库依尔的麦尔肯公司——全都是真正的粉刷匠，同时因为他们四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工作，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是不是会有人穿上工作服、拿着灰浆盆和刷子偷偷地混进医院里来。可以确定的是：托特格斯曾经宣称（这里谈不到承认，因为他的访问没有得到真正的证实），在玛丽亚·勃罗姆那里呆过，并且向她采访过，卡塔琳娜对这件事是知道的。麦尔肯先生也承认，当然这四个粉刷匠不总是同时都在的，如果有人要偷偷地混进来，那是很容易的。海能博士后来曾说，他要

控告《日报》公开登载卡塔琳娜母亲的谈话，以致惹起了一场纠纷，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简直是了不起的。——但是他的恫吓正象布洛纳曾经气势汹汹地要打斯特劳布莱德"一记耳光"一样，并没有实现。

四十四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午，布洛纳夫妇、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康拉德·巴特斯和卡塔琳娜在库依尔的克洛格咖啡馆会面（店主人是卡塔琳娜曾经做过厨师和服务员的那家旅店老板的侄子)。他们见面后互相拥抱，掉眼泪，连布洛纳夫人也流了泪。当然，在克洛格咖啡馆里同样也充满了狂欢节日的气氛。但是，店主人埃尔文·克洛格认识卡塔琳娜，并且和她很熟，也很尊重她，所以给这些相会的人提供他私人的一间起居室。在那里，布洛纳首先打电话给哈赫，取消了下午在博物馆回廊的约会，他告诉哈赫，卡塔琳娜母亲的突然死亡可能同《日报》的托特格斯的访问有关。哈赫比早晨要温和得多，他请他向卡塔琳娜表示个人的慰问，想来她一定不生他的气了，因为也没有理由要生他的气。此外，他表示随时准备效劳。他现在虽然正忙着审讯戈顿，但是还是能抽出时间来的。从对戈顿的审讯中还没有发现对卡塔琳娜不利的供词。戈顿非常倾慕她，并且在谈到她时非常公正。但是要探望戈顿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不是什么亲属关系，而"订婚"这个词的定义确实也是太含糊，而且也不能作为依据。

表面看来，似乎卡塔琳娜并没有被母亲死亡的消息所压倒。仿佛她反而变得轻松一些似的。当然卡塔琳娜同海能博士就那份登载托特格斯写的访问记和引述她母亲谈话的那份《日

报》进行了对质，海能博士对这次访问很愤慨，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种表示，只是说，这些人就是杀人犯，他们毁坏人的名誉。她对此十分藐视，但是很显然，她认为这类报业人员的义务，就是毁坏无辜的人的名誉、声望和健康。海能博士错误地猜测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曾经读过登载在《日报》上的布莱特罗——卡塔琳娜离婚了的丈夫——的暗示），他对她的冷静有点吃惊，因而问她，对《日报》的这种诡计她是否认为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卡塔琳娜不懂他的意思，只是摇了摇头。他让护士埃德加尔特带她到停尸室去。她和沃尔特斯海姆女士一道走进这间屋子。卡塔琳娜亲手从母亲的脸上揭开了尸布，说了一声"好吧"，在母亲的前额上亲了一下。护士埃德加尔特请她做祈祷，但她摇摇头说："不。"然后她重又把尸布盖好，谢了谢尼姑。当她刚一离开停尸室，就开始哭了，先是轻轻的，随后就愈来愈厉害，最后竟放声大哭起来。也许是她想到了她那死去的父亲，那时她才六岁，也是在医院的一间停尸室见了最后的一面。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想到，说得更确切些，感到有点惊异，卡塔琳娜无论是在儿童时代，还是在学校里，在受到虐待，或者为困难的环境所迫的时候，都从不曾见她哭过。后来卡塔琳娜非常客气地，几乎是很亲切地坚持，对外国女人霍尔娃和庇尔科为她母亲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她很镇定地离开了医院，也没有忘记让医院管理部门给她正在坐牢的哥哥柯尔特发一份电报通知他。

卡塔琳娜沉着地度过了这整个下午和晚上。虽然她一直在看这两张《日报》，并且和布洛纳夫妇、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康拉德·巴特斯对质了报上的全部细节以及对于这些细节的解释，仿佛她跟《日报》的关系变成了另外一种关系似的。用流行的话来说：少动感情而多作分析。在这个知己的、友好

的小范围里，在埃尔文·克洛格的起居室里，她还坦率地谈到了她与斯特劳布莱德的关系。有一次他在布洛纳家的晚会后送她回家，尽管她几乎是厌恶地严加拒绝，但是他还是把她送到门口，甚至陪她进了屋子，还竟然把脚伸在门缝里不让把门关上。当然他想无礼相强，由于她对他毫无好感，使他丢了脸，最后就只好走了——那时已是时过半夜了。从那天起，他老是钉着她，经常来，还送花，写信，有几次还闯进她的家里，乘机硬把戒指塞给她。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但她没有承认他的来访，也没有暴露他的名字，因为要向审讯的官员们解释清楚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任何关系都没有，甚至连一次吻都没有接过，是不可能的。别人不会相信，象斯特劳布莱德这样不仅有钱，而且在政治、经济、科学界都由于他那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很有名望地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电影明星式的人物，而她一个家庭管理员，竟然拒绝他，而且不是因为道德观念而只是为了不喜欢他，这谁会相信呢！他对她没有一点诱惑力，他把这绅士客人的全部事件看作是对她的小天地的讨厌的侵犯。她并不想把这个小天地变成一个亲昵的天地，原因是会引起误解，因为她一点也没有想要同斯特劳布莱德关系亲密起来——而且他反而使她陷入了没法向别人，更不用说向审讯部门作解释的境地。不过最后——说到这里，她笑了笑——她还是应该谢谢他，因为他的房子的钥匙对路德维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至少这个地址很重要，因为——说到这里她又笑了笑——路德维希没有钥匙肯定也是能够进去的，不过有了钥匙当然更容易一些。她也知道，狂欢节期间别墅是不用的，因为两天前斯特劳布莱德正好又一次来打扰她，一直强求她，而且向她建议，在他参加贝台立依浴场的会议之前和她到那里去过狂欢节的周末。没有错，路德维希确是曾经对她说过，他正在被警察追捕；但是他只告诉她说，他是

联邦国防军的逃兵，想逃到外国去——她第三次笑了笑说，她感到很高兴，能亲自把他从暖气管道中送走，并且指给他逃走的出口，这个出口最后可以从霍赫凯帕尔大街转角处的“临河雅寓”通到外边。不，她并不相信警察在监视她和戈顿，她只把这看作是一种强盗和警察的浪漫故事。事实上，路德维希在清晨六点钟就走了，直到早上她才感到，整个事情有多么严重。她对戈顿的被捕反倒显得轻松。现在，她说道，他就不至于再干蠢事了。整个这段时间内她曾经非常害怕，因为这个巴埃兹曼纳对她来说十分可怕。

四十五

这是确定无疑的，星期六下午和晚上几乎可以说过得都很好；是这样地好，以致所有的人——包括布洛纳夫妇、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特别沉默的康拉德·巴特斯——都相当安静。最后大家竟然感到——甚至卡塔琳娜自己也这样感觉——“形势缓和了”。戈顿已被逮捕，对卡塔琳娜的审讯已经结束，卡塔琳娜的母亲尽管是过早地，却是解脱了不治之症，而且已经开始办理安葬的手续。一个官府职员友好地答应，尽管是假日，在狂欢节前的星期一一定把所有必要的库依尔的文件都准备好。最后，也可以说是某种安慰，咖啡馆老板埃尔文·克洛格没有收他们的饭钱（包括咖啡、甜酒、土豆色拉、小香肠和点心）。在告别时他还说：“振作起来，卡塔琳娜，不是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你的。”在这种话里所包含的安慰的意义可能是相对的，因为究竟什么叫做“不是所有的人”呢？——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啊。他们一起回到布洛纳家里，度过晚上余下的时间。在那里，他们不准卡塔琳娜干活，她正在休假，应该放松一下。在沃尔特斯

海姆女士在厨房里准备面包的时候，布洛纳和巴特斯两人照看壁炉。事实上，卡塔琳娜也让人“溺爱”这一回。以后的情况很好，要不是死了人，而且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遭到逮捕，人们简直可以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举行舞会了，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在过狂欢节的时候啊！

布洛纳没有能够说服卡塔琳娜放弃她同托特格斯预定的访问。她显得很冷静而友好，以后——在证明这次访问真是所谓的“访问”后——当布洛纳回忆起这件事时感到周身战栗。他想，当时卡塔琳娜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坚决而冷静的态度坚持了这次访问的啊，而且又是多么毅然地拒绝了他的帮助。不过直到后来他也没有把握，究竟卡塔琳娜是否在这天晚上就决定了要杀人。在他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日报星期日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家听了一会严肃的音乐，又听了一会轻音乐。卡塔琳娜和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一样，谈了一会在格曼斯布洛希和库依尔的生活情况之后，他们就平平静静地分手了。大家又一次互相拥抱，但这一次却没有掉眼泪。当卡塔琳娜、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巴特斯同布洛纳夫妇彼此讲了许多友好、同情的话互相分别时，刚好是晚上十点半。布洛纳夫妇很庆幸他们回来得很及时——对卡塔琳娜来说正是时候。在已经熄灭的壁炉旁，布洛纳夫妇一边喝葡萄酒，一边讨论起新的休假计划，还议论了他们的朋友斯特劳布莱德和他的夫人玛特的性格。布洛纳请求他的夫人，在今后的来访客人中不要再用“绅士客人”这个词。她应该看到，这个词已变成一个神经质的字眼了。特罗德·布洛纳回答说：“以后我们将不会再有绅士客人来访了。”

四十六

可以肯定，卡塔琳娜在这个晚上的其余时间里是过得很平静的。她再一次试穿了阿拉伯女人的服装，还缝了几针，又决定用一块白色的手帕做面纱。大家还听了一会收音机，还吃了一些点心，然后就开始休息。巴特斯第一次公开地同沃尔特斯海姆女士一起走进卧室，卡塔琳娜就舒服地睡在沙发床上。

四十七

星期日的早晨，当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和康拉德·巴特斯起床时，早餐已经整整齐齐地准备好了。咖啡已经装在保暖壶里，卡塔琳娜已经胃口很好地吃完了早餐，坐在起居室的桌子旁，在看《日报星期日版》。上面几乎不是什么评论，而只是一些摘录。应该承认，卡塔琳娜的“故事”已经不再配上照片，作为头条新闻了。这次是路德维希·戈顿上了头版，标题是：《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温柔的情人在企业家别墅里被捕》。这篇新闻报道篇幅之大，甚至转到七至九版，而且还附有许多照片：第一次参加圣餐礼的卡塔琳娜，遣回故乡的士兵——她的父亲，格曼斯布洛希的教堂，还再一次刊登了布洛纳的别墅，以及大约四十岁时的卡塔琳娜的母亲，相当忧伤，非常憔悴，站在格曼斯布洛希她所居住的小屋前。最后一张是医院的照片，在这个医院里她是在星期五夜间到星期六之间去世的。正文是：

人们现在可以认为，作为不易看透的、现在还自由自在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第一个被证明了的牺牲品，

正是她自己的母亲，由于女儿的行为刺激了她，以致断送了她的生命。这是值得注意的。母亲在临死时，女儿还在温情脉脉地同强盗和凶手跳舞，这是极度的丧失人性，对母亲之死竟然没有眼泪。难道这个女人仅仅是冷酷的、很有心机的吗？卡塔琳娜从前的一位雇主，很有名望的乡村医生的太太，曾这样描写卡塔琳娜："她具有一种真正的娼妓式的本性，为了我的正在成长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病人，也为了我的丈夫的声誉，我必须将她辞退。"卡塔琳娜·勃罗姆是不是也参与了声名狼藉的菲耐姆博士的侵吞案件呢？（《日报》在当时已经报道过这一案件了。）她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假病号？她的哥哥为什么会犯罪？至于她为什么能青云直上，而且有很高的收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能得到解释。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卡塔琳娜·勃罗姆是帮助有血案的戈顿逃走的。她无耻地滥用了一个有极高名望的科学家、企业家的友好的信任和主动的帮助。根据《日报》得到的消息，几乎可以证明：并不是她接纳了什么绅士客人，而是她不经邀请自动地作了女客人，到别墅去进行访问。勃罗姆的神秘的驾车出游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她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的名誉，他的家庭幸福，他的政治生涯——关于这方面《日报》已经报道过多次——作孤注一掷，对一个忠贞的妻子的感情和四个孩子视若无睹。很显然，这个勃罗姆受了一伙左派人物的委托，要毁掉这个企业家的前程。

难道警察局和检察官能够信任那个想把勃罗姆洗刷干净的无耻的戈顿吗？《日报》曾再三提出了一个问

题：是不是我们的审讯方法太温和了？难道对没有人性的人还应该讲人道吗？

在布洛纳、布洛纳夫人和别墅的照片下写的是：

在这所房子里，这个勃罗姆自由地、没有人看管地、由布洛纳博士夫妇充分信任地从七点工作到十六点三十分。当毫无猜疑的布洛纳夫妇正在从事他们的职业的时候，这里会发生些什么呢？是否他们真是那样没有猜疑呢？他们同勃罗姆的关系是很知己的，甚至被认为是相当亲密的。邻居们对《日报》记者说，他们之间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友谊的关系。我们不去管那些暗示，因为它们跟事件本身没有关系。或者是否真是没有关系呢？特罗德·布洛纳博士夫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在一所著名的技术高等学院的一本年鉴里，而且直到现在还是以"红色的特罗德"而闻名的。尽管警察紧追戈顿，他怎么能够从勃罗姆的住所里逃跑呢？谁能对"临河雅寓"设计的每个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呢？无疑的就是布洛纳夫人。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和女工克劳迪亚·史坦姆异口同声地对《日报》说："他们（指勃罗姆和匪徒戈顿）在一起跳舞——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这不是什么偶然的初见，而是一次重见。"

四十八

后来有人批评巴埃兹曼纳，说他在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时

就已经知道戈顿躲在斯特劳布莱德的别墅里，还让他逍遥了四十八小时，使他有继续逃跑的危险时，巴埃兹曼纳笑了，并且说，戈顿从星期四半夜起就没有机会逃跑了。这所别墅坐落在树林里，四周有许多理想的"就象瞭望塔"那样的制高点。内政部长已经得到通知，并且同意采取一切措施，动用了直升飞机，当然它没有在附近降落，很快地运来了特种部队，布置在各制高点上。第二天早晨，地方警察机构又非常谨慎地增加了二十多名警察。最主要的事是要监视戈顿和谁接触，所取得的成果，就已证明担这次风险是必要的。戈顿一共有五起接触。当然，在逮捕戈顿以前，这五个接触的人都给查到而且拘捕起来了。他们的住所受到彻底的搜查。在戈顿不再同别人接触，并且轻率而毫不在乎地感到自己很安全，以致别人可以从外面监视他的时候，才把他抓了起来。此外，那一些重要细节的获得，巴埃兹曼纳要感谢《日报》的记者，刊印这份报纸的出版社和与这个出版社有联系的机关。这类机关，利用多种途径和不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可以得到连官方的调查员都搞不到手的某些材料。譬如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和布洛纳夫人一样并非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历。沃尔特斯海姆于一九三〇年生在库依尔，是一个女工的私生女。她的母亲还活着，但是在哪儿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并不是被迫去的，而是自动去的；她在老家库依尔，有一座小房子和几亩地，曾经多次请她回家，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第三次是一九六一年，建造边界墙①之前不久；但是三次邀请，三次都被断然地拒绝了。更有意思的是，沃尔特斯海姆的父亲，一个名叫罗姆的，

---

① 边界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61年8月13日在东西柏林交界处建造的一座三十三公里长的界墙，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而西德称其为"边界墙"或"隔离墙"。

也是一个工人，曾经加入过当时的德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逃亡去苏联，据说在那里失踪了。他——巴埃兹曼纳——认为，在德国国防军的失踪名单上，这一类失踪的人是找不到的。

四十九

由于我们没有把握确切而比较清楚地指出情节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被当作仅仅是一种暗示而忽略过去，或者被误解，因而请允许在这里再作一下提示：由于《日报》记者托特格斯毫无疑义地促使卡塔琳娜的母亲早死，但《日报星期日版》却把卡塔琳娜母亲的死亡归罪于她，此外——多多少少是明显地指控她偷了斯特劳布莱德别墅的钥匙！这一点应该再一次特别提出来，因为人们对此还拿不准。同样没有把握的是，大家是否真正知道《日报》满篇都是诽谤、捏造和歪曲。

这里就拿布洛纳为例，可以说明《日报》是怎样能够甚至影响到比较有理性的人们的。很自然，布洛纳居住的别墅区的人们是不看《日报星期日版》的。他们看一些比较高雅的报纸。因而布洛纳满以为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他只是有点不安地等着卡塔琳娜同托特格斯的谈话。中午的时候，当他打电话给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时，才知道《日报星期日版》上的那篇文章。而沃尔特斯海姆那方面自然认为布洛纳已经读过《日报星期日版》了。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布洛纳固然是一个热忱的、真实地照料卡塔琳娜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当他让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在电话中念了《日报星期日版》上的一些有关段落后，他竟然不相信——就象人们所说的——他自己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指的只是一种感觉，即听觉）；他让她再念了一遍，然后才相信了，于是——这样说合适些——他火冒

三丈。他狂喊、咆哮，在厨房里找来一个空瓶子，拿着它跑到汽车间，准备做一个燃烧瓶，去炸掉《日报》编辑部，然后再做一个去炸掉斯特劳布莱德的住宅，幸亏他的妻子在那里，把他阻止了。人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四十二岁的人，由于他的理智和明晰的办事能力，七年来一直受到吕定的重视，斯特劳布莱德的尊敬——在国际上，无论是在巴西还是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在北爱尔兰——总之这决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而纯粹是一个具有世界阅历的人物，竟愤怒到了要制造燃烧瓶的程度！

布洛纳夫人断然地把这种行为说成是自发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她批评他就象是讲身体上的一种病，或者受过伤的一处地方。但当她自己拿起电话，请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念了有关的一些段落后，这里必须得说说，她脸色变得相当苍白，她甚至干了也许比制造燃烧瓶更糟糕的事。她拿起电话就接吕定（这时他正坐着吃加奶酪和香料的草莓），简单地对他说："您这猪猡，卑劣的混蛋！"尽管她不说自己是谁，但凡是布洛纳的熟人都能从他夫人尖锐而刻薄的语言识别出来究竟是谁。另一方面，这对她的丈夫讲来又是太过分了，他还以为她是在跟斯特劳布莱德打电话呢。现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甚至在布洛纳夫妇之间的，还有布洛纳夫妇和别人之间的，但是没有人因此而被杀害，所以应该允许略去这些事情，不在这里细述了。这样的后果尽管是《日报星期日版》故意想要造成的，但并不重要，在这里提一提，只是为让读者明白，就连那些有文化有地位的人都愤怒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想要用最粗野的暴力手段了。

事实表明，卡塔琳娜在这个时间——大约十二点左右——离开了"金鸭"记者俱乐部；她不声不响地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小时，大概已经掌握了托特格斯的情况之后，就回到住所等

他。托特格斯大概是在一刻钟以后进去的。关于“访问”的情况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结局大家已经知道了（参看三）。

五十

为了要调查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师所传播的叫所有有关人士都惊讶的意外消息，即卡塔琳娜的父亲是个披着伪装的共产党员，布洛纳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这个村子里进行查核。起先，牧师承认他说的话，并说，《日报》如实地登载了他的话，但是对他自己的论断却无法证明，也不愿意证明；甚至说，他不需要证明，他一直能信赖自己的嗅觉，他凭嗅觉嗅出了勃罗姆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愿意给他的嗅觉下定义，也很不耐烦。当布洛纳说，如果他不能够给他的嗅觉下定义，那么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究竟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嗅出一个共产党员来，这时——很遗憾必须提一下——牧师变得相当不客气起来，问布洛纳说，你是不是天主教徒，而当布洛纳回答说“是”后，牧师就向他指出，不理解的地方，他有义务听从。从此以后，他自然在调查勃罗姆一家的情况时就遇到了困难，这一家人看来不特别讨人喜欢；他听到了关于卡塔琳娜已故母亲一些不好的事情，说她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已被开除的教堂差役偷喝了教堂圣器室里的一瓶弥撒酒；他也听到了关于卡塔琳娜哥哥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祸害；但是有关卡塔琳娜的父亲的共产主义，唯一的证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村里七家酒店中的一家对农民舒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并不太坏。”除此之外再调查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布洛纳一无所获，他的失败的调查的唯一结果是：他本人在村里纵然没有被骂成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却被看成是一个共产党

员。使他感到痛心的是，有一个当天曾经对他有所帮助，甚至表示同情的妇女，当他跟这个领养老金的女教员埃尔玛·楚勃琳告别时，她带着讥讽的微笑，甚至眨着眼睛对他说："为什么您不承认您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呢——您的太太更是这样的人。"

五十一

正当布洛纳在准备为卡塔琳娜辩护时，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暴行。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接受了卡塔琳娜的请求，担任了戈顿的辩护律师，而且一再企图让他们两人获得会见的许可。他坚持说，他们俩已经订了婚，而且正是二月二十日那个有问题的夜间订的婚，等等，等等。人们可以想象，这使《日报》会对他，对戈顿，对卡塔琳娜，对布洛纳夫人进行什么样的描绘，那就用不着在这里都写出来或者引述了。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允许背弃或者离开这个水平。这里可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期间大家对《日报》已经有所认识了。有一个谣言传了出来，说布洛纳要离婚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但这种即便毫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也总会造成夫妻之间的某些不信任。还有谣言说他的经济情况很坏，糟糕的是，事情正是那样。事实上他的负担是很重的，他以信用委托的方式把勃罗姆的住所接了过来。由于出了"流血事件"，这套房子既租不出去也卖不掉，同时价格下跌了，而布洛纳却必须按原价为它付清利息和债务等等。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预兆，"临河雅寓"所属的"哈夫特克斯"公司要对卡塔琳娜·勃罗姆进行损害赔偿的控告，因为她毁坏了这一地段租赁、商业贸易和社会的价值。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许多叫人生气的事情。建筑公司要把布洛纳夫人解雇，因

为她滥用了对她的信任，把公寓的下部结构图全告诉了卡塔琳娜，虽然第一次上诉被拒绝，但是很难说第二次第三次上诉的结果会是怎样。还有一件事：他们已经卖掉了一辆汽车，于是不久《日报》上就登了一幅布洛纳夫妇的一辆相当漂亮的高级汽车照片，下面的说明是："什么时候红色的律师需要换一辆老百姓的小汽车呢？"

五十二

吕定和斯特劳布莱德合伙的公司"吕斯特拉"对布洛纳虽然没有全部断绝关系，但已经不行了。用大家的话说，只是在做一些"扫尾工作"。有一次布洛纳接到斯特劳布莱德的一个简短的电话，说："我们不会让你们饿死的。"这件事使布洛纳感到非常惊奇，斯特劳布莱德不说"你"而说"你们"。当然，他仍然在为"吕斯特拉"和"哈夫特克斯"办事，但已经不再是国际范围的，甚至也不再是国内范围的，很少是地区性的，大多数是当地的一些杂事，这意思就是他只能和那些可恶的毁坏契约的人和喜欢诉讼的人打打交道。这些人因为曾经答应过他们用大理石装饰房屋，结果却只用了松姆霍夫地方的石板便提出诉讼；或者答应他们在浴室门上油漆三道，他们用刀子刮掉油漆，并雇人来鉴定，说只油漆了两道；或者浴盆水龙头滴水，垃圾箱残缺不全，有人就乘此机会，不肯按合同偿付已经谈妥的款项——人们现在就是把这样一些事情交给他处理，而在过去，为了参与一些重大的规划，虽然不能说经常往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帕斯波利斯①之间，但出出进进也相当频繁。这在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帕斯波利斯，古波斯首都，在今伊朗古城设拉子附近。

军事部门来说叫做降级，多半同丢脸的事有关。其结果是：布洛纳的胃开始犯病了，虽然还不是胃溃疡。糟糕的是：他自己还去柯尔福斯顿海姆进行调查，想从那个地区的警察局长那里了解，戈顿被捕时，钥匙是插在里头还是外头，或者别人是否发现什么迹象，说明戈顿是破门而入的。问这些有什么用呢，这些问题能把事情调查清楚吗？这是确定无疑的——这些问题对胃溃疡毫无用处。尽管警察局长海尔曼对他态度非常好，也不会把他怀疑成共产党人，但他也劝告他，不要插手此事。布洛纳的唯一安慰是，他的夫人对他更加和蔼。她的嘴巴虽然还很刻薄，但已不再是对他，而只是对别人，尽管不是对所有的人。她的计划是把别墅卖了，把卡塔琳娜的住所接过来，搬到那里去住，所差的只是住房不够大，因为布洛纳想把他城里的事务所退了，在家里处理未了的业务。布洛纳是一个具有享乐主义性质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被人喜爱，喜欢作乐的同事，他所举办的晚会，一直为人所欢迎，而现在却开始过着清苦的生活。本来他总是非常重视他的衣着，现在却很不注意，而且也不再时髦了。有些同事甚至说，他连卫生也不讲究了，身上开始发出一种气味。看来这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了，因为事实上——这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用不着隐瞒——他身上不再有过去的那种一个男人在早晨淋过浴、用过很多香皂和香水的味道了。总之，在他身上，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的朋友们——他还有一些朋友，其中有检察官哈赫，他同他由于审判路德维希·戈顿和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事件还有业务上的关系——都担心，尤其担心的是他不再对《日报》——这报纸总是一再地写短文攻击他——进行斗争了，变得忍气吞声起来。他的朋友们甚至考虑得很远，怀疑布洛纳是否藏有武器或爆炸物，因而请布洛纳夫人暗地里进行检查，因为被枪杀的托特格斯有个接

班人，他名叫埃金哈德·泰普勒，此人的行径和托特格斯一个模样。正是这个泰普勒，在布洛纳到当铺里去时，拍了一张照片，显然是在橱窗外边照的。《日报》的读者可以看到，布洛纳和当铺商人正在为一只戒指谈判。当铺商人正用放大镜在进行鉴定。照片的说明是："红色的来源真的没有了吗，还是在这里装穷呢？"

五十三

布洛纳最大的顾虑是劝说卡塔琳娜在审讯时供认，她在星期日早晨才决定向托特格斯报复的，一点也没有想杀害他的意图，只是想吓唬他一下。她在星期六请托特格斯来访问时，原来的想法是要适当地向他谈谈她的意见并且要他注意，他在她和她的母亲的生活里干了些什么；即使在星期日，在看了《日报星期日版》上的文章以后，她也没有要杀他。应该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卡塔琳娜老早就企图谋杀，并且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他试图使她——而她却说，星期四看了报上的文章后她就想杀死他了——明白，某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偶然也会有谋杀的念头，但是谋杀的念头和有计划的杀害还是有区别的。此外，使他不安的是，卡塔琳娜毫不感到后悔，因此在开庭时她也必然会这样表现出来。再说，她也毫不沮丧，反而有些幸福之感，因为她"同亲爱的路德维希是在同样的条件下"生活。她作为一个模范的犯人，在监狱中帮厨，如果审讯延迟的话，她会被安置在监狱的经济部门；但是那里的人知道后，并不很欢迎她。人们早就听说她那"一丝不苟"的名声——因此，无论是主管方面还是囚犯方面——都害怕她。大家认为，卡塔琳娜很有可能在整个坐牢时期——人们估计会有十五年，最后改

判为八至十年——做经济方面的工作。这被作为一个可怕的消息在整个监狱里流传着。人们很明白，由于她一丝不苟，再加上有计划，有才能，这样的人在监狱里或者在领导机关里，没有一个地方会受欢迎。

五十四

正如哈赫通知布洛纳的那样，对戈顿的杀人控告已不能成立，因而也不起诉了。他不仅从联邦国防军里逃跑，而且（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道义上）极大地损害了这个造福的机构。这些已被确证。他没有盗窃银行，而是抢劫了一个保险柜，内有两个团的军饷，还有数目可观的储备金。另外他还伪造了账目，偷盗了武器。人们估计他也要判八至十年徒刑。他被释放时大概三十四岁，卡塔琳娜是三十五岁。她已经有了将来的计划。她计算，他们的资本等到他们被释放时可以得到不少的利息，然后准备“到某一个地方，当然不是在这里，开一个自营饭馆”。至于她是否可以作为戈顿的未婚妻，看来不是较高一级而是最高一级才能决定的。这要经过适当的申请和麻烦的批准手续。此外，还有戈顿从斯特劳布莱德的别墅里打出去的电话，都是打给联邦国防军成员或他们的太太的，这里包括有军官和军官夫人们。人们把它视为一件不大不小的骚动事件。

五十五

当卡塔琳娜只是自由受到了限制，几乎是不受干扰地在狱中等待将来的命运时，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的处境却日益令人苦恼。她深受打击，因为人家诋毁了她的母亲，和作为斯大林

主义的牺牲品而死去的父亲。人们可以从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身上看到一种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康拉德·巴特斯要缓和一下也没有成功。埃尔丝愈来愈多地专门承办一些冷菜招待会，从设计、配备到监制。她把攻击的矛头愈来愈转向那些招待会的来客，不管他们是外国或本国的记者、企业家、工会干部、银行家或高级职员。“有时候，”最近她对布洛纳说，“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克制自己，要不然我真想把一盘土豆色拉扔到某个泽格先生的大礼服上，或者把一盘鱼块倒在某个齐克夫人的胸怀里去，也让他们尝尝害怕的味道。您应该从另一方面，从我们这方面去设想一下，他们在这里是如何张大了嘴巴，或者我们不妨说，张大了血盆大口，穷凶极恶地抢着吃涂上了鱼子的小面包——我知道，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有的是百万富翁或者是百万富翁的太太，但他们还偷香烟、火柴和其他的小东西。其次，他们还带着塑料袋，把咖啡倒在里面——所有这一切都由我们纳的税开支，如此等等。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吃早餐或午饭，但是象老鹰一样围着冷菜桌猛吃——当然我并不想借此来侮辱老鹰。”

五十六

直到今天，这件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的暴行，很遗憾地还为许多人所注意。在画家弗莱德里克·勒·波歇的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上——布洛纳是他的一个支持者——布洛纳第一次又碰见了斯特劳布莱德。后者满面红光地向他走来，但是布洛纳不想跟他握手。斯特劳布莱德却紧紧拉住他的手，轻声地向他说：“我的上帝！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认真，我们不会对你们过不去的，遗憾的只是你在跟你自己过不去。”——很遗憾，这里得

补充报道一下，就在这时候布洛纳真的给了斯特劳布莱德一个耳光。我们很快地说一下，以便读者可以同样快地把它忘掉：这时从斯特劳布莱德的鼻子里大约流出了四到七滴血，但是更坏的是，斯特劳布莱德虽然退让了，却还是说："我原谅你，原谅你的一切，由于你处在这样一种感情状态下。"看来，这几句话更加激怒了布洛纳，于是——据目睹者说——他们就"徒手扭打"起来了。正当斯特劳布莱德和布洛纳在大庭广众之间扭打的时候，《日报》的某个名叫库顿瑞的记者，也就是那个被枪杀的记者舍纳的后任，把这场景拍了下来。人们用不着为此而责怪《日报》——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对它的性质已经有所认识了——它刊登了这幅扭打的照片，文字说明是："保守的政治家挨了左派律师的袭击。"当然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刊登出来的。在展览会上玛特·斯特劳布莱德和特罗德·布洛纳也碰上了。玛特·斯特劳布莱德对特罗德·布洛纳说："我实在同情你，亲爱的特罗德。"特罗德对此回答说："赶紧把你的同情放到冰箱里去吧，那里存放着你所有的感情呢。"然后，当她一次又一次地从玛特那里听到原谅、宽大、同情，甚至几乎是亲爱的话语，例如"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即使你的刻薄话也不能减少我对你的同情"的时候，特罗德就用一些话回答了她，这些话却不能在这里重复。对于它们，只能作为参考形式加以发表。特罗德的话对女士是不大合适的；她用这些话暗示了斯特劳布莱德多次企图亲近卡塔琳娜，——而且违反了律师夫人所应该遵守的保密义务——她指出了戒指、信件和钥匙，这些东西"是你的一再被拒绝的求爱者放在某一所房子里的！"两个争吵的夫人最后由弗莱德里克·勒·波歇劝开了。这位画家忍不住，敏捷地用一张吸水纸把斯特劳布莱德的鼻血吸了起来，把它加工成——如他所说的——"一幅小型的艺术品"，题名为

《多年友谊的终结》，并在上面签了名。他没有把它送给斯特劳布莱德，而是送给了布洛纳，而且对他说："你可以把它高价卖掉，增加一些收入。"人们可以从这个最后发生的事件和一开始就描写的暴行中看出，艺术倒是的确具有社会作用的。

五十七

非常遗憾，一直到最后也不能报道一些和谐的事，而且这样的希望也极少。发生的事情总是不圆满，总是对立的。人们当然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妇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一个很平常的跳舞会，四天以后她——我们这里不是在审判而不过是在报道，并且是以真实材料为根据的——成了谋杀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报纸的报道。而且两个非常好的老朋友之间动了怒，关系紧张，最后还动手打架。两个夫人之间也发生了尖锐的口角。抛开了同情，丢弃了友爱。这是极其不愉快的变化。一个欢乐的、世界闻名的、热爱生活、热爱旅行、喜欢奢华的人——会对自己这样漠不关心，以致身上发出了气味！甚至有了口臭！他要卖掉他的别墅，他跑当铺。他的夫人要另外寻找工作，因为可以确定，在第二次上诉时她要失败；这个聪明的夫人甚至准备以"室内建筑顾问"的名义到一家家具公司去当个推销员，但是那里的人告诉她："我们这里日常光临的顾客，恰恰就是您要跟他们吵架的那些人。"总之一句话，看来情况不妙。检察官哈赫已经私下告诉朋友，但是还不敢对布洛纳本人说，人们可能要拒绝他作为辩护人，因为他极其偏颇。事情会怎样发展呢，又会如何结束呢？布洛纳如果不再可能见到卡塔琳娜，并且跟她——人们现在对这事用不着再隐瞒了！——没

机会握手的话，他会怎样呢？毫无疑问，他爱她，但她并不爱他，他连一点希望也没有，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她“亲爱的路德维希的”！必须补充一下，这里所说的“握手”，完全是单方面的，当卡塔琳娜把文件或记录或诉讼案卷递给他时，他就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比一般要长久一些，大概是十分之三、四，最多十分之五秒钟。真该死，人们在这里怎样才能恢复和谐呢？他对卡塔琳娜的热烈的倾慕之情——我们不妨说出来吧——并不能使他多洗洗澡。只有他一个人探出了手枪的来历——巴埃兹曼纳、默丁和他们的助手都没有做到这点——这件事也不能安慰他。说是“探出”也许太过分了。这涉及到康拉德·巴特斯的一次自动供认，他在那场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是个纳粹，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所以他至今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曾经是库依尔地方的政治领导人，当时可能帮过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母亲办过事。他把从前因职务而配备的那支旧手枪藏了起来，但是有一次愚蠢地拿出来给埃尔丝和卡塔琳娜看了，他们三人甚至还到树林里去，在那儿练习射击。卡塔琳娜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射击手，引起了巴特斯的注意，原来她在年轻时当过射击协会的服务员，有机会打枪。星期六晚上，卡塔琳娜向巴特斯要了他的房门钥匙，理由是，他应该理解，她很想单独呆一会儿，而她自己的住所对她来说已经是死掉了，不存在了……星期六她呆在埃尔丝那里，星期日就从巴特斯的房间里把手枪拿了出来，吃完早餐，看过《日报星期日版》的文章后，她就扮做阿拉伯女人到记者俱乐部去了。

五十八

最后还竟然有一些勉强可以算是高兴的事情告诉读者：卡

塔琳娜向布洛纳讲了事实的经过，也向他讲了在杀死记者和去默丁处投案之间的六、七个小时是怎样度过的。人们很幸运，这段叙述可以一字一句地摘录下来，因为卡塔琳娜把这一切已经用书面写了下来，布洛纳在法庭审判时也使用了这些材料。

“我到记者俱乐部去只是想看他一眼。我想知道，这个毁了我生活的人是什么样子，举止又是怎样；是怎样说话，喝酒，跳舞的。在这以前我到康拉德的房间里，拿到他的手枪，并亲自装上了子弹。当时我们在树林里射击时，我是打得很准的。我在俱乐部里等了一、二个小时，但是他没有来，我想，如果他太令人恶心，就根本不同他会面了。如果以前我曾经看见过他，这次就不会去见他了。可是他没有到酒吧间来。为了避免别人前来打扰，我请求店主人让我在酒柜上帮忙。这个人叫彼得·克拉夫罗姆，我是在业余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有时作为服务员的领班到那里去帮忙。彼得当然知道在《日报》上登载的关于我的事情。他答应我，如果托特格斯一出现，就给我一个信号。因为这时正是狂欢节的时候，我也被邀请去跳了几次舞。但是由于托特格斯还没有来，我变得有些神经紧张起来，因为我不愿意毫无准备地同他见面。到十二点我就回家了，对于这个肮脏的满是灰尘的住所，我真感到厌恶。在门铃响之前，我刚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得及把手枪的保险机扳开，把它放进手提包里。一切就绪，门铃就响了。当我一打开门，他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我原来以为，他是在楼下按的铃，那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是他已经乘电梯上来了，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我真感到吃惊。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个混蛋，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蛋。而且他很漂亮，就象人们所说的漂亮那样。您看到过照片。他说：‘小花（小勃罗姆），我们两人现在干些什么好呢？’我一声不响，往屋子后边退。他就跟着我进来，而且说：

'为什么你失魂落魄地看着我，我的小勃罗姆——我提议，现在我们先来蹦一个吧。'这时，我已经拿了我的手提包，他跟着我来，拉我的衣服，我想：'蹦吧，我不反对！'于是我拿出手枪，立刻朝他开了枪。二次，三次，四次。我不清楚到底开了几枪，关于这点您可以在警察局的报告中看到。您不会相信，一个男人要拉我的衣服，对我来说是件新鲜的事——如果您从十四岁起工作，为别人料理家务，这您就习以为常了。可是，这个家伙——他竟然要'蹦'。因此我想：好吧，那现在就蹦吧！当然，他是没有估计到这一着的。他还瞪了我有半秒钟之久，非常惊愕，就象在电影上一个人突然一下被射死一样。后来，他倒了下来。我相信，他是死了。我把手枪丢在他的身旁跑了出来，乘电梯下了楼，回到俱乐部酒吧间。彼得感到很惊奇，因为我几乎还不到半个小时又回来了。然后我就继续在酒柜上帮忙，不再跳舞了，整个时间心里在想：'这不是真的吧！'但是我知道，这是真的。彼得有时向我走来，对我说：'你的伙伴今天不会来了。'我就回答说：'大概是这样吧。'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到四点钟时，我把烧酒斟出，从桶中放出啤酒，打开香槟酒瓶，把罐头鱼上给顾客。然后我没有向彼得告别一声就走了。我先到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大概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我想到母亲，想到她所过的该诅咒的困苦的生活；也想到父亲，他老是发怨言，骂国家、教会、官府和官吏、军官，一切都骂，但是当他跟这些人中的某一个打交道时，又总是奴颜婢膝。又想到我的前夫布莱特罗，想到他曾经向托特格斯讲过的恶劣的脏话；当然也想到我的哥哥，他老是没完没了地向我要钱，当我只赚得几个马克时，他也要拿去干些蠢事，买衣服买摩托车或者赌博；我也想起了村里的牧师，在小学时，他总是叫我'我们的红色的小卡塔琳娜'，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

是我的脸却一下就变红了，于是全班的人都大笑起来。是的，我自然也想到了路德维希。后来我从教堂出来，随便跑进了一个电影院；之后又从电影院里出来，又跑进一个教堂，因为在狂欢节的星期日这里是唯一可以找到一点安静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到了在我的房间里的那个被枪杀的人。我不后悔，也不怜惜。他要蹦，我已经蹦了，不是吗？有一瞬间我曾经想，他就是那个在夜里打电话给我，也是好久以来老是扰乱可怜的埃尔丝的那个家伙。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我还让他胡说了一通，想听出这是谁的声音，可是这究竟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时我忽然很想喝一杯浓咖啡，于是就到贝克林咖啡馆去。店主人的太太凯蒂·贝克林，我在家政学校时就已认识了，因而我没有去外间，到了他们的厨房里。凯蒂对我很好，虽然她相当忙。她给我倒了一杯她自己喝的咖啡，这种咖啡是按照老祖母的方式用磨成细末的咖啡冲的。然后她开始谈起《日报》上登载的事情，很友好，但是她似乎至少相信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们怎么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呢。我试着向她解释，但是她不理解，只是眨着眼问我说：‘你真的爱这个人？’我回答说：‘是的。’后来我谢了她的咖啡，走到外面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一直开往默丁那里，当时他对我是非常友好的。”